

目 錄 Contents

◆ 孫中山研究 ◆

- 中山革命思想的緣起 李金強 1
香港近三十年來的孫中山研究 文兆堅 6

◆ 體育史研究 ◆

- 唐代蹴鞠考略 范永聰 14
世界史視野下的中國體育史——評介徐國琦 (Xu Guoqi) 的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布琮任 19

◆ 常州研究 ◆

- 花鳥正宗：惲壽平與常州畫派 周佳榮 22
毗陵多閨秀：清代常州才媛 丁 潔 26

◆ 院校巡禮 ◆

-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學士學位課程簡介 區志堅 羅玉芬 30

◆ 書 評 ◆

- 周佳榮著《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第二版) 黃耀忠 36
林學忠著《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 廖懷恩 39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編
《買辦與近代中國》 文兆堅 42

◆ 學界動態 ◆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活動匯報 (2010 下半年) 資料室 45
「性別視野中的中國歷史新貌」交流會與展覽 資料室 46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活動匯報 (2010 年) 資料室 47
2010 年香港學界活動簡報 資料室 49
2011 年春季香港學界活動預告 資料室 52

本期封面：香港聖約翰大教堂（黃錦麗繪），奠基於 1847 年，是基督教新教在東方建立的早期教堂之一。

❖ 孫中山研究 ❖

中山革命思想的緣起

李金強

香港浸學大學歷史系

孫中山於清季起而倡導革命，建立興中會與同盟會，揭櫫三民主義，創建民國。然新建民國，不但未能致國家於富強，反而陷家國於內戰外侵之局，至有「人民深遭痛苦，乃責革命家之造亂」，而倡導革命之孫中山亦備受責難。如何在革命破壞後重建國家，實為孫氏所念茲在茲者。¹ 1923年初孫氏於陳炯明叛變被滇、桂軍擊退後，又與蘇聯代表越飛（Adolf Abramovich Joffe, 1883–1927）發表聯合宣言，擬採聯蘇政策。遂由上海南返廣州，決定重組政權之際。並向英國示好，遂有同年二月中旬香港之行，² 受到香港總督司徒拔（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 1876–1947）之款待。其間2月20日，並於香港大學陸佑堂發表演說，講述其革命思想之產生。他說：「我於何時及為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是也，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為香港」。³ 直指香港為其革命思想緣起之地。

孫氏進而剖析其革命思想緣起與香港之關係。此乃將香港與故鄉香山兩地的社會與政治作一比較，發現香港「市街……秩序整齊，建築闊美，工作進步不斷……香港政府官員皆潔己奉公，貪賄之事絕無僅有」，而故鄉及中國反是。遂下決心改良中國「惡政府」，並拋棄其「醫人生活」而從事「醫國事業」，並謂「由此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⁴ 從而引起學者對孫中山革命思想緣起之研究，提出除與香港具有關係外，或謂源於檀香山，或謂始起於中法越南戰爭，或謂來自洪秀全之太平天國革命，或謂受到師友如鄭士良（1862–1902）、楊衢雲（1861–1901）、何啟（1859–1914）、區鳳墀（1847–1914）、王煜初（1843–1903）、鄭觀應（1842–1922）等之影響，其中孫中山革命思想緣起於香港，雖未獲所

1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在香港大大學的演說〉，《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6卷，頁59–70；引文，7卷，頁116–117。

2 1923年2月17日至21日孫中山於香港一行及其活動，參黃宇和：《中山先生與英國》（台北：學生書局，2005），頁419–446；並參陳福霖：〈孫中山與香港，1923年1月–6月〉，《孫中山、廖仲凱與中國革命》（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頁61–76，指孫氏香港之行，乃聯蘇政策之同時，亦爭取英國、香港的支持。

3 孫中山：〈在香港大學的演說〉，頁113。

4 同上。

有學者如張玉法、陳錫祺，Harold Z. Schiffrin 等完全同意，⁵ 然綜觀孫氏一生，其中青年求學時期，先後於香港生活達八年之久，於香港西醫書院習醫的大學時期，尤為關鍵。⁶ 一直以來，香港出身之學者如吳倫寬霞、霍啓昌、黃宇和亦相繼就此探析，關注香港對孫中山革命思想所起之影響，⁷ 故香港因素，顯然未容忽略。筆者亦就此探求，並出版《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的求學與革命》一書，探索孫中山在香港革命思想的緣起，及其在香港策動的武裝起義，藉以說明香港在孫中山所倡導之革命，及其所扮演的歷史角色。⁸ 現就地緣、人和及思想三方面之新角度說明之。

（一）地緣——啟蒙明燈在上環

香港自 1841 年開埠以來，英國人於香港島北岸修建維多利亞城。其地域包括西起上環、中環以迄東面的下環（灣仔）。其中劃定今中環與金鐘之間山坡為政府山（Government Hill），自政府山至海岸一帶，為外商所建的商貿地帶，修建橫貫東西的皇后大道，故中環一帶，乃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宗教、軍事之中心。⁹ 而由華南移居入港的華人，則在殖民地政府的安排下，聚居於上環之下市場（Lower Bazaar），及太平山街。前者乃今蘇杭街及文咸街一帶，為華商之出入口，批發貿易所在；設南北行公所，是為本地華人商業中心。後者為今水坑口以東，城隍街以西，及皇后大道以南，為香港華人聚居之地。華人自 1850 年起，即於此區之荷李活道，創建文武廟，拜祭文昌帝及關帝。於普仁街創設東華醫院（中醫院），透過民間信

-
- 5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頁 143-150。張氏指出孫氏對基督徒演講，則謂受教會學校教育及外國傳教士自由精神的感染。對國人則謂乃外國侵略，清廷無力抵抗所致。在香港大學演說則強調革命思想起自香港。陳錫祺：〈孫中山革命思想產生和革命事業的開始〉，《孫中山與辛亥革命論文集》（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4），頁 65-82。並參 Harold Z. Schiffrin,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pp. 10-40.
 - 6 參羅香林：《國父的大學時代》（台北：商務印書館，1972）一書。
 - 7 吳倫寬霞：〈孫中山早期革命運動與香港〉，《孫中山研究論叢》，3 集（1985），頁 69-71；霍啓昌：〈認識港澳史與辛亥革命研究一些新方向芻議〉，《辛亥革命與 20 世紀的中國》（北京：中國史學會，2002），下，頁 2330-2343，吳、霍二人均注意香港中央書院西方史地課程及考試題目對孫氏革命思想的影響。又霍氏一文，並提出孫中山時期之香港工商業和市政的現代化建設，如衛生、交通（電車、渡海輪）、電報、水塘等均對孫氏產生影響。近日黃宇和更利用翠亨村的口述歷史，提出孫氏由日常生活觀察，比較兩地情況，以翠亨村食用污染山水，而香港水塘則為清潔食水，從而刺激其對清政府不滿而有革命思想之產生。參黃宇和：〈任重道遠：孫逸仙成長之重要性及探索之重重困難〉，《紀念孫中山誕辰 140 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9），下冊，頁 1125-1146。
 - 8 相關之著述尚有；李進軒：《孫中山先生革命與香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劉家泉：《孫中山與香港》（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兩書。李、劉分析孫中山革命思想之緣起，其論點仍承襲註 5 所列學者之觀點，分別見李書，頁 6-13；劉書，頁 336-343。
 - 9 何佩然：《地換山移——香港海港及土地發展一百六十年》（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頁 17-24；鄭寶鴻：《港島街道百年》（香港：三聯書店，2000），頁 10-14；丁新豹主編：《香港歷史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2008），頁 14-15。於政府山上興建聖約翰聖堂（1849），輔政司署（1850）、總督府（1855），雅賓利政府宿舍、兵頭花園（1864）、美利砲台等。

仰及醫療組織，得以成爲香港華人社區公共事務的仲裁及管理者。與此同時，隨著香港開埠，西方基督教傳教士相繼來華宣教，其中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即於上環華人社區鄰近之士丹頓街及伊利近街交界，興建總部差會大樓，從事對華人宣教、醫療、教育及出版事工。並將原設於馬六甲的英華書院，遷移至此。又於荷李活道創建華人教會——道濟會堂，及雅麗氏紀念醫院，而香港西醫書院亦設於院內。此外，該會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建議港府開設中央書院於歌賦街，以中英雙語、西方史地格致之學科，培訓華人子弟，其他歐美傳教士，亦先後來港開設教會學校，包括早期灣仔摩利臣山的馬禮遜紀念學校，聖保羅書院（鐵岡下亞厘畢道，1851），聖約瑟書院（堅道，1876），相繼招收華人子弟，遂能習識西學。而華人聚居之上環，由是成爲中西文化交流之地。聚居於此之華人，遂於中西文化涵濡後，產生文化自覺，逐漸孕育出新文化之啓蒙，而革新思想亦由此起。¹⁰（參附圖）

（二）人和——香港雙語精英群體之出現

香港即在上述中西文化交流下，不少華人子弟相繼於馬禮遜紀念學校、英華書院、聖保羅書院、中央書院、聖約瑟書院等英文中學，接受中、英雙語，西方史地格致等學科之培訓下，從而產生一批具備中英語文及西學能力的雙語精英。較著者包括 60 年代出身於馬禮遜紀念學校，而留學英美的容閱（1828–1912）、黃勝（1827–1902）、黃寬（1827–1878）；70 年代出身於聖保羅書院的陳靄廷（？–1902）、伍廷芳（1842–1922）；80 年代出身於中央書院的何啓（1859–1914）、胡禮垣（1847–1916）；90 年代同爲出身於中央書院的孫中山（1866–1925）、謝纘泰（1872–1938），及聖保羅書院的楊衢雲等人。其中伍廷芳及何啓先後至英國，於倫敦林肯法律學院（Lincoln's Inn）攻讀法律，中山則於香港西醫書院習醫，而陳靄廷爲香港著名中文報紙《華字日報》創辦人，謝纘泰則於日後創設著名英文報紙《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上述雙語精英，身處十九世紀下半葉香港，目睹清季祖國在外力入侵下，國勢一落千丈，始悉傳統文化之缺失，西方文化之富強。遂起而倡導西學，力主革新，期望借西方文化之長，改革失敗落後之舊中國。其中以楊衢雲及謝纘泰爲首，與中央書院之陳芬、周昭岳、黃國瑜、羅文玉、溫宗堯、陸敬科；聖保羅書院之胡幹之、何汝明，聖若瑟書院之劉劉燕賓等，相互結交。上述眾人於畢業後，分別任職洋行、學校及政府機關等新式事業，於工作之餘，時常聚會，討論時局。至 1892 年 3 月 13 日，遂於港島百子里 1 號成立「輔仁文社」，以楊衢雲年長，故推舉爲會長，並以拉丁文「盡心愛國」（*Ducit Amor Patriae*）爲座右銘，起而倡導西學，講求革新，遂成爲馮自由所謂「吾國人組織新學團體之先河」。爲清季首見倡導西學之學會。¹¹ 與此同時孫中山於香港西醫書院就讀時，亦結識師友，遂與西醫書院同學陳少白，及於廣州博濟醫院習醫時相識之尤列（1865–1936），時相聚會於其同鄉楊鶴齡（1868–1934）祖業，位於歌賦街的楊耀記商號。四人均以洪秀全自況，言行反清，時人目

10 李金強：《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的求學與革命》（香港：孫中山紀念館，2008），頁 93；並參丁新豹主編：《香港歷史散步》，頁 144–145。

11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台北：世界書局，1984）（一），頁 119；並參李金強：《西學搖籃——清季香港雙語精英的誕生》，黃愛平、黃興濤主編：《西學與清代文化》（北京：中華書店，2008），頁 692–703。

為「四大寇」。¹² 輔仁文社及四大寇，日後遂起而聯合，於香港中環史丹頓街 13 號，成立興中會總會，是為清季革命運動之最初萌動。

（三）思想——革新主張的誘啓

19 世紀下半葉，地處南天海角的香港，即在上述中西文化交流的環境下，湧現一批中英雙語的華人精英，面對祖國之種種危難，遂憑藉其身處殖民地，得以接觸及體驗西方文明的先進經驗，起而參予國內模仿西法的洋務運動建設，並進而倡導維新，力主學習以英國為首的政治、軍事、經濟、教育體制。前者如容閔、黃勝、伍廷芳，參與兵工，留學、外交等洋務事業的擘劃。後者除南寓香江之王韜外，尚有陳靄亭、何啓、胡禮垣等，借用報刊以文字倡言變法維新。而香港華人精英由是與清季洋務運動及維新運動發生密切關係，成為清季沿海地區，首倡改革的先驅人物。其中上述人物，除胡禮垣外，容閔、黃勝、伍廷芳、王韜、陳靄亭、何啓等，皆由於具有基督教背景，得以獲取西學新知而成為改革人物，故被美國史家 Paul Cohen 標貼為「基督教改革者」(Christian Reformer)，香港雙語華人精英遂成為全國性矚目的改革家，香港亦由此一躍而成為清季海外華人改革言論的中心地帶，而孫中山之革新思想即由此而起。¹³

其時最早來華宣教之英國倫敦傳道會，於鴉片戰後，由馬六甲遷至香港，於港島荷李活道建立華人教會道濟會堂。該會華人牧執傳道，分別為王煜初、區鳳墀、黃勝、何啓等人。而孫中山就讀之香港西醫書院，即與該堂鄰接。¹⁴ 其中王煜初、區鳳墀、何啓均與孫氏情同師友。倫敦傳道會之華人傳道、信徒，自鴉片戰爭以降，早已倡論革新。前有太平天國時期洪仁玕提出《資政新論》，繼有王韜創辦《循環日報》倡導變法自強。而更重要則為何啓、胡禮垣二人，於 1887 年起而指出清廷洋務兵工建設，皆屬枝節，根本之圖在於刷新內政，提出以「民政為本，軍政為末」。力主政治上復「民權」，行「君民共治」的立憲政體；經濟上興辦鐵路、輪船，發展私營工商業，建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而教育則主力求西學，學習西方知識，建立新式教育。二人日後出版《新政真詮》一書，為二人新政言論變法思想之代表作。¹⁵ 據謝纘泰所言，康梁維新一派，大多捧讀何胡二人之著述。¹⁶ 與此同時，道濟會堂牧師王煜初於《萬國公報》發表改革主張，力主禁煙，改革漢字；建議起用傳教士翻譯西書，協助

12 馮自由：〈興中會四大寇訂交始末〉，《革命逸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69），頁 13-15。

13 余英時：〈孫逸仙的學說與中國傳統文化〉，《人文與理性的中國》（台北：聯經出版專業，2008），頁 387-416。余氏從中國傳統文化入手，分析孫中山革命思想的由來，指陳此乃十九世紀今文經學及經世思想發展至康有為，由其繼承，孕育出變法思想。並謂孫氏革命思想，得見此一痕跡。故孫氏革命思想由此而起。此點恐值商榷，孫氏革命思想，仍需由「基督教改革家」的主張入手，而非康、梁。

14 李金強：《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的求學與革命》，頁 78-89。

15 何胡二人之改良思想，參李金強：〈香港華人與中國——何啓、胡禮垣之個案研究〉，《書生報國——中國近代變革思想之源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頁 40-56。

16 謝纘泰：《中華民國革命秘史》，《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史料專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頁 804。

變法；設立商部，發展商業；興辦大中小學，培育人才等。¹⁷ 而區鳳墀亦從事禁煙運動，提出農業改良，興實業，辦教育，改良軍旅。¹⁸ 由此可見，19 世紀下半葉道濟會堂教牧及信徒，相繼倡導改革言論。而值得注意者為青年時期的孫中山，於 1883 年冬受洗信教後，常至道濟會堂參加聚會崇拜，得以聽道於王煜初牧師，王牧之子王寵惠（1881–1918），日後撰寫〈追懷國父述略〉一文，指出孫中山「與先君子相過從，互相研討耶穌與革命思想，二人相處，恍若志同道合」。¹⁹ 而區鳳墀、何啓又先後為其中文及醫學老師，關係密切。孫氏對區、何的主張，自然熟悉。孫中山日後發表農業改良言論，以至〈上李鴻章書〉（1894），指出清廷船堅炮利改革是「捨本圖末」，與何啓、胡禮垣重視體制改革言論相同；且對何、胡重視日本明治維新，孫氏深表認同，主張中國實行「日本化」，進而建議施行富強治國之四大綱領，此即「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盡其流」，而歸結於「推行農政」為其時之急務。後者又可見區鳳墀主張之影子。由此可見，香港實為孫氏革新思想之溫床。²⁰ 故香港與孫中山革命思想，其關係密切可知。

然而隨著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孫氏益感滿清政府之腐敗，無力改革，遂毅然起而以武力從事革命。

附圖 維多利亞城



17 李金強：〈近代華人教牧的誕生——王煜初牧師的生平及其思想〉，李金強、梁家麟、湯紹源主編：《中華本色——近代中國教會史論》（香港：建道神學院，2007），頁 155–172。

18 楊襄甫：〈區鳳墀先生傳〉，區斯湛、區斯深編：《區鳳墀先生傳：追悼會彙錄》（香港，1914），頁 1–14。

19 王寵惠：〈追懷國父述略〉，《困學齋文存》（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7），頁 1。

20 何胡重視日本明治維新，見李金強：〈香港華人與中國——何啓、胡禮垣之個案研究〉，頁 40–41，47–48；並參趙雨樂：〈何啓、胡禮垣的日本觀〉，《文化中國的重構：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維與活動》（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6），頁 23–35；李金強：《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的求學與革命》，頁 80–88。

❖ 孫中山研究 ❖

香港近三十年來的孫中山研究

文兆堅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1923年2月19日，因返回廣州而途經香港的孫中山（1866–1925），獲邀在香港大學進行演講，他在演講中表示：

我本未預備演說，但願答覆一問題，此問題即前此屢有人向我提出，而現時聽眾中亦必有許多人欲發此問者。我以前從未能予此問題以一相當答覆，而今日則能之。問題維何？即我於何時及如何而得革命思想及新思想是也。我之此等思想發源地即香港。¹ 眾所周知，孫中山青少年時期，曾經在香港生活與學習了一段時間。繼後由他領導的反清革命運動過程中，香港在革命思想的宣傳、革命起義的策劃、革命物資的籌措、革命機關的創立，均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² 因此孫中山與香港的關係自然受到學者的注意，出現了若干重要的研究成果。林啓彥的〈近三十年來香港的孫中山研究〉一文可以說是最早的一篇文章，論述香港的孫中山研究發展，交代了1980年代以前這方面研究的情況。³ 事實上香港學術界對推動孫中山研究發展，一直以來沒有鬆懈，除發表相關著作外，並且開辦多個學術研討會及講座。同時又舉辦公開活動，促進社會大眾對孫中山的認識。孫中山紀念館的誕生標誌著香港人對孫中山的關注，不再只限於學術界。本文旨在進一步闡述以上的活動，以加深我們了解本港在表揚孫中山的成績。

（一）孫中山學術研討會的舉辦

珠海書院於1980年代舉辦了兩個以孫中山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1981年9月，主辦「孫逸仙博士在香港」國際學術會議，有六十多位英國、美國、德國（當時的西德）、澳洲、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港台學者參與，會議文章共有36篇。這些文章後來收錄於1982年11月

1 孫中山：〈在香港大學的演講（1923年2月19日）〉，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7卷，頁115。

2 李進軒：《孫中山先生革命與香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

3 林啓彥：〈近三十年來香港的孫中山研究〉，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534–543。

由該校出版的《珠海學報》第 13 期中，而文章主題分為十項，計有：(一) 孫中山在香港受教育之經過及其革命思想的形成；(二) 孫中山在香港設立興中會總部及其對革命之影響；(三) 孫中山策進革命之歷史與成就；(四) 孫中山思想與世界思潮；(五) 孫中山與民生主義；(六) 孫中山與亞洲民族運動；(七) 孫中山在中國歷史上之地位；(八) 孫中山與人文主義思想；(九) 孫中山與美國；(十) 三民主義與國民黨。⁴

為慶祝孫中山 120 歲誕辰，並且發揚孫中山在開創中華民國、推動中國現代化的貢獻，珠海書院於 1985 年 11 月舉辦「孫中山先生與中國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共有 63 位中外學者參加，提交了 32 篇論文，它們主要探討孫中山的性格與思想，所有論文均收載於 1987 年 10 月出版的第 15 期《珠海學報》中。⁵

香港浸會大學亦熱衷推動孫中山研究。該校歷史學系與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合作，於 2001 年 11 月舉行「辛亥革命、孫中山與廿一世紀中國」學術研討會。參加該研討會的學者逾百人，分別來自香港、中國內地、台灣、日本、澳洲、歐美等地，宣讀論文七十餘篇。⁶ 繼後這些論文結集成書，即林啓彥、李金強、鮑紹霖主編的《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上下冊（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2005 年）。該論文集收載了 15 篇孫中山研究的文章。⁷

除歷史學系外，同校的近代史研究中心與香港歷史博物館於 2005 年 12 月，合作舉辦「孫中山學術研討會——兩岸三地學者的論述」，會議文章共有 13 篇，探討課題分別是孫中山與香港師友關係、孫中山的視覺形象、孫中山與中俄外交，以及中國內地孫中山研究情況等。⁸ 該研究中心又於 2010 年 5 月，與香港中山學會、中華港澳之友協會主辦「中山思想現代化對當前兩岸四地政經關係的影響」研討會，共有 6 篇會議論文，包括：陳蘊茜〈孫中山符號在台灣傳播與意義轉化（1945-1975）〉、邵宗海〈中山先生與民族主義思想〉、周佳榮〈香港網絡與亞洲視角——孫中山思想的當代意義〉、曹俊漢〈全球化下中山思想發展的新思維：對國家角色的詮釋〉、李金強〈兩岸關係發展與中山思想的啓迪〉、龐建國〈中山思想與中國模式〉。

（二）講座與其他活動的開展

香港歷史博物館與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歷史學系合作舉辦孫中山講座，邀請中、台、港與海外學者進行演講。該講座從 2005 年 4 月開始，直至 2006 年 11 月才結束，總共有 12 講。（表 1）

4 〈序言〉，《珠海學報》，13 期（1982 年 11 月），頁數缺。

5 〈序言〉，《珠海學報》，15 期（1987 年 10 月），頁數缺。

6 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資料室：〈香港學界活動簡報〉，《當代史學》，4 卷 4 期（2001 年 12 月），頁 93。

7 該論文集內容，詳參文兆堅、黃耀忠：〈評《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上下冊〉，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編：《人文中國學報》，13 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頁 509-516。

8 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資料室：〈浸大近代史研究中心學術匯報（2005 年下半年）〉，《當代史學》，7 卷 3 期（2006 年 3 月），頁 83。

表 1 孫中山講座一覽

舉辦日期	演講題目	講者
1. 2005 年 4 月 11 日	孫中山與汪精衛	邵銘煌（台灣）
2. 2005 年 6 月 15 日	孫中山的革命大計與興國遠謀	王爾敏（台灣）
3. 2005 年 10 月 4 日	孫中山與廖仲愷	陳福霖（香港）
4. 2005 年 1 月 21 日	孫中山與香港	李金強（香港）
5. 2006 年 2 月 18 日	孫中山與廣東	邱捷（中國內地）
6. 2006 年 3 月 18 日	孫中山與南洋	梁元生（香港）
7. 2006 年 4 月 22 日	孫中山與美國及法國	陳三井（台灣）
8. 2006 年 5 月 13 日	孫中山與日本	林啓彥（香港）
9. 2006 年 6 月 10 日	孫中山與梁啓超——革命、維新兩派的合作嘗試和分途發展	周佳榮（香港）
10. 2006 年 8 月 19 日	孫中山與蔡元培	潘漢唐（台灣）
11. 2006 年 9 月 2 日	孫中山與台灣	呂芳上（台灣）
12. 2006 年 11 月 25 日	孫中山與倫敦	黃宇和（澳洲）

資料來源：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資料室：〈浸大近代史研究中心活動簡報（2005 年上半年）〉，《當代史學》，7 卷 2 期（2005 年 9 月），頁 47；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資料室：〈浸大近代史研究中心學術匯報（2005 年下半年）〉，《當代史學》，7 卷 3 期（2006 年 3 月），頁 83；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資料室：〈「紀念孫中山 140 歲誕辰」專題講座〉，《歷史教育論壇》，12 期（2007 年 1 月），頁 61。

孫中山紀念館於 2006 年 12 月正式建立，紀念館位處於香港中西區甘棠第。館內展出多件與孫中山有關的珍貴歷史文物，藉此使社會大眾加深認識孫中山的生平事蹟、孫中山與香港的關係，還有香港在近代中國現代化中的作用。孫中山紀念館亦舉辦多次演講活動，目的是促進孫中山歷史知識的普及化。（表 2）此外，本港中西區區議會於 1996 年設立「孫中山史蹟徑」，介紹一些關於孫中山求學及革命運動的建築物或歷史遺址，與孫中山紀念館的普及化工作互相配合。⁹

表 2 孫中山紀念館講座一覽

舉辦日期	演講題目	講者
1. 2007 年 1 月 27 日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的人與事	李金強
2. 2007 年 5 月 5 日	孫中山與香港基督教會	李志剛
3. 2007 年 6 月 30 日	孫中山與道濟會堂	劉紹麟
4. 2008 年 2 月 16 日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的生活——由港大荷花池說起	龍炳頤
5. 2008 年 3 月 8 日	孫中山、伍廷芳與香港	鍾寶賢
6. 2009 年 3 月 28 日	孫中山與日本	蘇維初
7. 2009 年 7 月 11 日	孫中山在港的足跡	梁炳華

9 詳參孫中山紀念館網址，<http://hk.dr.sunyatsen.museum/b5/related.sites.php>。

8. 2009 年 10 月 24 日	孫中山先生在香港西醫書院的同學和他們的背景	何屈志淑
9. 2010 年 12 月 14 日	志同道合——陳友仁與孫中山	陳元珍

資料來源：2007 至 2010 年由香港歷史博物館出版的《香港歷史博物館通訊》。

民間人士亦積極推動香港的孫中山研究發展。1998 年 8 月，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由本港商人、孫中山後人，以及華僑組織共同成立。該基金會的成立宗旨，就是「紀念孫中山，宣揚其歷史功績。弘揚其民主、愛國精神及天下為公的崇高思想，推動中國各地文化教育福利事業的發展。」¹⁰ 自成立以來，該基金會除資助大專院校舉辦有關孫中山研究的學術會議外，並且與本港的博物館、學術研究機關合作舉行「孫中山與辛亥革命」徵文比賽、「孫中山與近代中國」歷史圖片展覽等活動，向大眾宣傳與推廣關於孫中山的歷史知識。¹¹

（三）孫中山研究成果的出版

有學者在評價香港對推動學術研究的表現時，表示「光是起著橋樑作用是不夠的，學術交流的活動，必須有本地的參與，必須有本地的成果。」¹² 本港史學界除舉辦有關孫中山的學術研討會外，他們亦出版刊物與著作，使香港在促進孫中山研究發展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1980 年代初香港中山學會成立，在 1983 年出版兩期的《中山季刊》，刊載中外學者的孫中山研究論文。¹³ 此外，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則出版兩種有關孫中山研究的著作，分別是王爾敏《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大計與興國遠謀》（2005 年）和區志堅、彭淑敏、徐振邦《孫中山在港史蹟考察與旅遊》（2007 年）。

部分學者開展孫中山研究，以實際的研究成果，提升香港在孫中山研究中的地位。他們的研究課題，主要是孫中山與港澳、孫中山與外國、孫中山與基督教、孫中山與民國政治，以及孫中山思想。以下介紹各課題的研究成果。

（1）孫中山與港澳

李金強《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的求學與革命》（香港：孫中山紀念館，2008 年）一書旨在「透過對孫中山同時期師友記述及革命史料的探尋和辨析，重構孫中山在港生活及革命活動之歷程。進而探討香港在清季革命運動中的角色，為香港與近代中國歷史關係，提供較為清晰的歷史圖像，使此一孫中山與香港的集體記憶得以重見於現今。」¹⁴ 全書共分五章：

-
- 10 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資料室：〈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簡介〉，《當代史學》，4 卷 2 期（2001 年 6 月），頁 25。
 - 11 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資料室：〈香港學界活動簡報〉，《當代史學》，4 卷 4 期（2001 年 12 月），頁 92-93。
 - 12 周佳榮：〈序論：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再出發〉，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研究新趨勢》（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4 年），頁 4。
 - 13 林啓彥：〈近三十年來香港的孫中山研究〉，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頁 536。
 - 14 李金強：〈序言〉，氏著：《一生難忘：孫中山在香港的求學與革命》（香港：孫中山紀念

(一) 史料篇：孫中山及其師友關係；(二) 求學篇：孫中山的成長歷程；(三) 改革篇：香港華人與清季革命運動的醞釀；(四) 革命篇(上)：香港興中會總會的成立及其武裝起義(1895–1905)；(五) 革命篇(下)：同盟會時期香港於革命運動中角色的探討(1905–1911)。該書作者又撰寫論文，探討孫中山的大學時代經歷，並從地理角度觀察孫中山的求學與革命生活。¹⁵

吳倫霓霞則發表多篇中英文論文，如〈孫中山早期革命運動與香港〉、〈孫中山先生在香港所受教育與其革命思想之形成〉、〈興中會前期(1894–1900)孫中山革命運動與香港的關係〉、〈孫中山上李鴻章書與香港的淵源〉(The Hong Kong Origins of Dr. Sun Yat-sen's Address to Li Hung-chang)、〈革命的形成——香港對孫中山早期政治思想的影響〉(The Making of a Revolutionary——Hong Kong in the Shaping of Sun Yat-sen's Early Political Thought)，分析香港與孫中山反清革命運動的關係。¹⁶她還編輯《孫中山在港澳與海外活動史蹟》(廣州、香港：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1986年)一書，圖文並茂描述孫中山在香港的學習生活與政治活動。

霍啓昌與內地學者張磊、盛永華合撰《澳門：孫中山的外向門戶和社會舞台》(澳門：澳門大學、東方文萃，1996年)一書，並且發表若干篇論文，闡述孫中山與香港、澳門的關係，並介紹關於孫中山在香港的革命運動史料。¹⁷此外，余偉雄、¹⁸ 陳福霖、¹⁹ 吳志華、²⁰ 李谷

館，2008年)，頁7。

- 15 李金強：〈再論孫中山的大學時代(1887–1892)〉，林家有主編：《孫中山研究》，1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43–157；〈從省港澳地域觀察孫中山的求學與革命〉，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紀念孫中山誕辰14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頁1107–1124。
- 16 黃文江、劉義章：〈香港史開拓者：吳倫霓霞的教研工作〉，氏編：《香港社會與文化史論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2002年)，頁205–207。
- 17 霍啓昌：〈幾種有關孫中山先生在港策進革命的香港史料試析〉，孫中山學術研究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440–455；〈孫中山先生早期在香港思想成長的初探〉，中國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孫中山和他的時代——孫中山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929–940；〈十九世紀香港的現代化與孫中山先生早期的革命思想〉，孫逸仙思想與廿一世紀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會編：《孫逸仙思想與中國現代化論文集》(台北：編者印，1993年)，頁25–29；〈淺釋港澳檔案所藏有關孫中山與澳門關係研究的一些資料〉，《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2卷(1998年11月)，頁78–85。
- 18 余偉雄：〈孫逸仙博士策進革命運動與香港的關係及香港所保存的革命史蹟〉，《珠海學報》，13期(1981年11月)，頁166–177。
- 19 Chan F. Gilbert, "An Alternative to Kuomintang-Communist Collaboration: Sun Yat-sen in Hong Kong, January-June 1923,"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13, no. 1 (1979), pp. 127–139；陳福霖：〈孫中山與香港，1923年1月至6月〉，氏著：《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61–76。
- 20 吳志華：〈香港何以能成爲孫中山革命運動的基地〉，《亞洲研究》，41期(2001年12月)，頁187–211；〈香港總督的美意——港英政府對孫中山革命運動的態度〉，林啓彥、李金強、鮑紹霖編：《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下冊(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2005年)，頁624–639。

城、²¹ 施其樂 (Rev. Carl Thurman Smith, 1918–2008)²² 各人，亦撰文探討香港對孫中山思想及其革命運動形成的影響、港英政府對孫中山革命運動的態度、孫中山在香港的學習生活等。上述學者中，以吳倫霓霞與霍啓昌的表現最為突出，有學者表示「霍啓昌及吳倫霓霞均能運用第一手的香港史料（包括港英政府的殖民地檔案、英政府的外交部檔案以及香港早期的報刊雜誌等），對孫中山及其革命同志早年在香港活動的實況，加以核正和申論，而卓有成績。」²³

（2）孫中山與外國

黃宇和先後撰寫《孫逸仙在倫敦蒙難真相：從未披露的史實》（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年）、《中山先生與英國》（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有限公司，2005年）、《孫逸仙在倫敦，1896–1897：三民主義思想探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三書及多篇論文，²⁴ 討論孫中山在倫敦被清廷綁架這段歷史，並且分析英國對孫氏革命思想與運動的影響。上述三本著作，以《孫逸仙在倫敦蒙難真相：從未披露的史實》這本書最受到學者注意。該書前身是英文著作，就是《英雄形象的來源：1896至1897年間在倫敦的孫逸仙》（*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 Sun Yat-sen in London, 1896-1897*），於1986年出版。此書日後有經過修訂的簡體字版，即《孫逸仙倫敦蒙難真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全書論述孫中山在倫敦被綁架與獲救的經過，並剖析這段經歷對孫氏英雄形象的形成與革命領袖地位的確立所造成的影響。有學者指出該書是孫中山

倫敦蒙難研究的「突破性佳作」，是「孫中山研究學的一個里程碑」。²⁵ 不過亦有學者批評該書立論不穩、內容出現錯誤，還有誇大孫氏倫敦經歷對其思想發展的影響。²⁶ 此外，尚有學者撰文探討孫中山的亞洲觀及其外交政策、日本在孫中山革命運動中的作用。²⁷

-
- 21 李谷城：〈孫中山、康有為論香港社會〉，楊允中主編：《孫中山思想與華人世界》（澳門：澳門學者同盟，2008年），頁314–322。
- 22 Smith Carl T., “Sun Yat-sen as a Middle School Student in Hong Kong,” *Ching Feng*, vol. 20, no. 3 (1977), pp. 153–165; “Sun Yat-sen’s Middle School Days in Hong Ko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lice Memorial Hospital,” *Ching Feng*, vol. 21, no. 2 (1978), pp. 78–94.
- 23 林啓彥：〈近三十年來香港的孫中山研究〉，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頁537。
- 24 有關黃宇和的孫中山與外國關係研究論文，詳參黃宇和：〈參考資料及書目〉，氏著：《孫逸仙在倫敦，1896–1897：三民主義思想探源》（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556–557。
- 25 李金強：〈辛亥革命的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頁807；李又寧：〈評黃宇和著：英雄形象的來源〉，《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4期（1987年9月），頁169。
- 26 Chan Gilbert, “Review of *The Origins of An Heroic Image: Sun Yat-sen in London, 1896-1897* by J. Y. Wo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9, no. 1 (Jun., 1989), pp. 229–241；陳福霖：〈研究孫中山的幾個歷史問題——兼評黃宇和教授有關倫敦蒙難的新著〉，氏著：《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頁38–45。
- 27 周佳榮：〈中日關係與印度問題——孫中山論亞洲前景〉，氏著：《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8年），頁244–251；林啓彥：〈孫中山與日本〉，周佳榮、侯勵英編：《中國文明——文化轉型的歷程》（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10年），頁265–277。

(3) 孫中山與基督教

李志剛撰寫了〈香港基督教會與孫中山先生現代化思想〉、〈基督教徒對孫中山先生之認同新探〉、〈孫中山之革命運動與老師區鳳墀長老之關係〉三文，闡明香港基督教會及其教育事業對孫中山的影響、香港基督徒對孫中山反清革命運動的貢獻，還有孫中山的基督教信仰。²⁸ 李志剛強調基督教對孫氏思想與事業有很大的影響，他表示「惟是孫中山先生現代化思想的形成，當然與香港教會學校的教育有直接的關係，至於孫中山先生所推行的革命運動，更離不了早期在港教徒的鼓勵與參與。終孫中山先生的一生，故屬一位虔誠的教徒，而其事業的成功與基督教會實有深厚關係。」²⁹ 施其樂的〈孫逸仙受洗及其與部分基督徒的關係〉(Sun Yat-sen's Baptism and Some Christian Connections) 和容應莢的〈香港的基督教徒家族與孫文的革命運動〉(香港のキリスト教徒家族と孫文の革命運動) 側重闡述孫中山與生活在香港、中國沿海城市，甚至海外地區的基督徒之關係。³⁰

(4) 孫中山與民國政治、孫中山思想

陳福霖《孫中山、廖仲愷與中國革命》(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0年)收有〈從反清到反帝：孫中山對中國民族主義的闡釋〉、〈孫中山與五四運動〉、〈孫中山與中國國民黨改組的起源〉、〈孫中山與革命同盟：1903年至1907年和1922年至1925年之比較研究〉各篇文章，對孫中山的政治思想、孫中山與五四運動的關係，還有孫氏與同盟會、國民黨，以及共產黨的關係進行探討。該書亦收錄〈台灣學者研究孫中山及中國革命的趨向和成果〉和〈評述有關孫中山與國共合作的重要著作〉兩文，評介中外學者在孫中山與第一次國共合作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繼後他亦撰文闡述孫中山晚年的革命思想。³¹ 陳萬雄的〈孫中山與五四知識分子〉和陳明鈺的〈孫中山先生與華南勞工運動之發展〉，闡析孫中山與新文化運動核心分子、參與五四運動的青年學生，還有廣州工人階層之間的關係和演變。³²

在孫中山思想研究方面，包括：林啓彥的〈辛亥革命前孫中山的民權思想與民約論〉、〈孫

28 李志剛：〈香港基督教會與孫中山先生現代化思想〉，《珠海學報》，15期(1987年10月)，頁393-402；〈基督教徒對孫中山先生之認同新探〉，《華人神學期刊》，4卷1期(1991年3月)，頁77-84；〈孫中山之革命運動與老師區鳳墀長老之關係〉，林啓彥、李金強、鮑紹霖編：《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下冊(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2005年)，頁640-655。

29 李志剛：〈香港基督教會與孫中山先生現代化思想〉，頁399。

30 Smith Carl T., "Sun Yat-sen's Baptism and Some Christian Connections," *Ching Feng*, vol. 22, no. 4 (1979), pp. 170-189；容應莢：〈香港のキリスト教徒家族と孫文の革命運動〉，《孫文研究》，28輯(2000年7月)，頁1-15。

31 陳福霖：〈孫中山晚年的革命思想〉，胡春惠編：《近代中國與亞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上冊(香港：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1995年)，頁63-79。

32 陳萬雄：〈孫中山與五四知識分子〉，《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刊》，3期(1989年1月)，頁3-21；陳明鈺：〈孫中山先生與華南勞工運動之發展〉，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孫中山先生與近代中國學術討論集》第一冊(台北：編者印，1985年)，頁265-278。

中山論政黨政治〉、〈孫中山的海防建設思想概觀〉、〈孫中山的軍事思想〉（與李鏗合著），³³ 以及李谷城的〈孫中山的民權思想與《中國旬報》的「民權論」〉，³⁴ 這些文章剖析孫中山的民主政治與軍事思想。楊意龍（1949–1996）的〈鏡海叢報的發現及其對研究孫中山先生早期思想的意義〉、〈改良及革命：孫中山早期的救國思想〉（Reform Versus Revolution: A Reappraisal of Sun Yat-sen's Early Thoughts on National Salvation）與李金強的〈孫中山之早期思想——農業改良言論探討（1887–1895）〉三篇文章，集中討論青年時期孫中山的政治與經濟改革思想。³⁵

（四）結 語

香港的孫中山研究始於 1960 年代中期，繼後的三十多年間，以王德昭（1914–1982）與羅香林（1905–1978）在這方面研究的貢獻最大，前者「長於對孫中山先生思想演變的分析」，後者專注探討早年孫中山在香港的事蹟。³⁶ 二人所開創出來的研究方向，日後都有其他學者將它們延續下來，繼續進行探索，創造研究成果。若比較王、羅二人的孫中山研究方向在 1980 年代以後的發展，可以看到羅香林所開展的孫中山與香港關係研究，成績較為突出，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除延續前輩學者的研究領域外，香港學者亦勇於嘗試，擴充孫中山研究的範圍，展開孫中山與外國或基督教關係的研究，締造了不少研究果實，使香港的孫中山研究出現多元化的特色。此外，從前香港的孫中山研究，只是依靠大專院校及其學者的支持；隨著特區政府建立孫中山紀念館，加上民間成立團體組織，香港的孫中山研究基礎較以前更加穩固，相信對推動這方面的研究發展，可以帶來一定的幫助。回顧過去辛亥革命八十與九十周年，香港史學界都舉辦學術研討會，藉此紀念這場革命運動。孫中山是辛亥革命領袖，自然成為這些學術研討會的熱門探討課題，³⁷ 因此辛亥革命研究直接推動本地的孫中山研究。2011 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學術界很大機會舉辦慶祝辛亥革命的學術研討會，我們可以預期香港的孫中山研究在 2011 年會再一次熾熱起來。

33 林啓彥：〈辛亥革命前孫中山的民權思想與民約論〉、〈孫中山論政黨政治〉、〈孫中山的海防建設思想概觀〉，氏著：《近代中國啓蒙思想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8 年），頁 191–215、216–231、232–245；李鏗、林啓彥：〈孫中山的軍事思想〉，《孫中山研究》，1 卷（1986 年），頁 210–229。

34 李谷城：〈孫中山的民權思想與《中國旬報》的「民權論」〉，林家宥、李明主編：《看清世界與正視中國：「孫中山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182–195。

35 Young John Dragon, “Reform Versus Revolution: A Reappraisal of Sun Yat-sen's Early Thoughts on National Salvation,”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 16 (1985), pp. 133–145；楊意龍：〈鏡海叢報的發現及其對研究孫中山先生早期思想的意義〉，《珠海學報》，15 期（1987 年 10 月），頁 361–367；李金強：〈孫中山之早期思想——農業改良言論探討（1887–1895）〉，氏著：《書生報國：中國近代變革思想之源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145–161。

36 林啓彥：〈近三十年來香港的孫中山研究〉，孫中山研究學會編：《回顧與展望——國內外孫中山研究述評》，頁 535–536。

37 李金強：〈九十年代香港的辛亥革命〉，《歷史與文化》，1 卷（1998 年 1 月），頁 84；侯勵英、范永聰：〈「辛亥革命、孫中山與廿一世紀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33 期（2002 年 3 月），頁 28–45。

❖ 體育史研究 ❖

唐代蹴鞠考略

范永聰

香港浸學大學歷史系

（一）引言

蹴鞠，又名躡鞠、蹋鞠、踏鞠、蹴鞠、蹙鞠或戲毬等，在唐代（公元 618–907 年）的流行程度甚高，僅次擊鞠。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球類運動項目，蹴鞠在漢代（公元前 202–公元 220 年）時已經發展得非常成熟，而且深受中國人歡迎。¹ 及至唐代，蹴鞠更呈現多元化的發展，絕對稱得上是中國古代足球運動的鼎盛時期。

（二）唐代蹴鞠運動的特色

唐代蹴鞠的發展，有幾方面很值得注意，也可說是中國古代足球運動史上的大突破。首先，唐人發明了「氣鞠」，或稱「氣毬」。漢代蹴鞠所用的鞠，是一個用皮革包裹著大堆毛髮的實心毬，並非充氣皮毬。² 唐代的鞠，已經發展成有毬皮和毬膽的氣鞠。毬皮主要用牛或馬的皮造成，而毬膽來自牛的膀胱，那是一塊可蓄氣的薄膜片。³ 唐人徐堅（公元 659–727 年）撰《初學記》中有言：「鞠即毬字，今蹴鞠曰戲毬。古用毛織結為之，今用皮。以胞為里，噓氣閉而蹴之。」⁴ 文中所說的「胞」，就是指牛的膀胱。

- 1 學者普遍認為，中國古代蹴鞠運動於戰國時代（公元前 476–公元前 221 年）末期開始在江南一帶流行，至漢代（公元前 202–公元 220 年）發展成熟，成為一種廣受歡迎的球類運動項目。參閱林伯原著：《中國古代體育史》（台北：五洲出版社，1996 年），頁 147–148。至於漢代蹴鞠運動的發展情況，可詳參林伯原著：《中國古代體育史》，頁 147–154；劉秉果著：《插圖本中國體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頁 86–93；崔樂泉編著：《圖說中國古代體育》（西安：世界圖書出版西安公司，2007 年），頁 31–33。
- 2 《漢書》〈霍去病傳〉中載：「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躡鞠也。」原文後附唐代顏師古（公元 581–645 年）注曰：「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蹙躡而戲也。」見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第八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五十五，〈衛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頁 2488–2489。證明漢代流行的蹴鞠用毬是實心毬。
- 3 林伯原著：《中國古代體育史》，頁 222。
- 4 徐堅撰：《初學記》，載董治安主編：《唐代四大類書》，第三卷（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唐詩《答日休皮字詩》曰：「八片尖裁浪作毬，火中燻了水中揉。一包閉氣如長在，惹踢招拳卒未休。」⁵ 唐人仲無顏（生卒年不詳）所撰《氣毬賦》有謂：「氣之爲毬，合而成質。俾騰躍而攸利，在吹噓而取實。盡心規矩，初因方以致圓；假手彌縫，終使滿而不溢。」⁶ 上述詩文明顯指出唐代蹴鞠用毬是由八片皮革縫製而成，而且灌氣其中，是爲氣鞠。由於唐代發明了氣鞠，皮毬富有彈性，故有利於騰躍，也自然產生了一些新的蹴鞠方法與技巧，促使唐代蹴鞠的發展更趨多元化。

其次，唐代蹴鞠比賽中有使用毬門的習慣，此爲前代所無，充分反映唐人的非凡想像力與無窮創意。仲無顏《氣毬賦》中云：「苟投足之有便，知入門而無必。時也廣場春霽，寒食景妍。交爭競逐，馳突喧闐。或略地以丸走，乍凌空以月圓。」⁷ 當中「知入門而無必」及「交爭競逐」兩句，已明顯指出唐代蹴鞠比賽的主要形式是兩隊對抗，而競逐的目標爲把鞠踢進對方的毬門之內。蹴鞠比賽的過程必然是非常激烈的，這從「或略地以丸走，乍凌空以月圓」一句可以得知。由此可見，當時的蹴鞠比賽與現代足球頗相類近。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文字中有「寒食景妍」一句，說明唐人每每於寒食節時進行蹴鞠活動，以之作爲節慶活動之一。由是唐代蹴鞠，屬於中國傳統節慶體育活動，富有濃厚的文化意味。

唐代蹴鞠運動的最大特色，是形式多樣化。除了上文介紹的雙毬門兩隊對賽模式外，還有四種起源於唐代的蹴鞠形式，對後世蹴鞠運動的發展產生非常深遠而重大的影響。第一種是「打毬」，又稱「打鞠」，它是不用毬門的蹴鞠模式。參與這種蹴鞠運動的人士，身體各部分都可以接觸皮毬，旨在控球時不斷轉換花樣。比賽時不拘人數，各自獨踢；如無比賽對象，也可以作爲表演項目，獨自踢毬；更可視之爲個人健身運動。⁸ 這種蹴鞠模式，主要鍛鍊參與者的個人控球技巧，與現今非常流行的「花式控球」有異曲同工之妙。但由於欠缺比賽競爭性，故並非最吸引人的蹴鞠運動形式。第二種是「白打」。白打也不用毬門，比賽時可以兩人對踢，也可以多人參與，以踢毬是否到位決定參與者之間的勝負。⁹ 這種形式主要鍛鍊參與者的傳球技巧，由於不用在蹴鞠場上激烈競逐，故特別適合女性參與。唐代詩人王建（公元 767–831 年）的《宮詞》有云：「宿妝殘粉未明天，總立朝陽花樹邊。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¹⁰ 清楚描繪了寒食節時婦女進行白打蹴鞠的情況。第三種是「趨鞠」，以踢高毬爲主要比賽模式。段成式（公元 803–863 年）撰《酉陽雜俎》中載：「張芬曾爲韋南康（筆者按：即韋皋，公元 745–805 年）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常於福感寺趨鞠，高及半塔。」¹¹ 又王維（公元 701–761 年）詩《寒食城東即事》謂：「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綠蒲涵白芷。溪上人家凡幾家，落花半落東流水。蹴鞠屢過飛鳥上，鞦韆競出垂楊裡。

2003 年），卷第四，〈歲時部下〉，頁 1488。

- 5 歸氏子：《答日休皮字詩》，載常法寬編著：《圖說中國古代足球》（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年），頁 158。
- 6 仲無顏：《氣毬賦》，載劉秉果、趙明奇、劉懷祥著：《蹴鞠——世界最古老的足球》（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80。
- 7 仲無顏：《氣毬賦》，頁 80。
- 8 林伯原著：《中國古代體育史》，頁 223。
- 9 關於「白打」，詳見劉秉果、趙明奇、劉懷祥著：《蹴鞠——世界最古老的足球》，頁 35–44。
- 10 王建：《宮詞》，載常法寬編著：《圖說中國古代足球》，頁 149。
- 11 段成式撰：《酉陽雜俎》（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卷五，〈詭習〉，頁 52–53。

少年分日作遨遊，不用清明兼上巳。」¹² 《酉陽雜俎》中的「高及半塔」及《寒食城東即事》內的「蹴鞠屢過飛鳥上」，相信都是對趨鞠的描述。當中或有誇張之嫌，然唐代時期已發明了氣鞠，基於氣鞠「俾騰躍而攸利」的特點，就算要做到「高及半塔」及「蹴鞠屢過飛鳥上」，也未必不可能。第四種是單毬門比賽。進行比賽時，毬門設於蹴鞠場的正中央，毬門設計頗為特別，門在上而網在下。參與比賽的兩隊球員分列單毬門的左右兩方。若左方隊員把毬踢到右方時，右方隊員必須用腳把毬接好，然後再踢回左方去。若其中一方未能接好皮毬，便告失分。¹³ 這種比賽在形式上與現今的排球接近，只是排球用手，蹴鞠用腳而已。其缺點十分明顯，就是競技性大大降低，而且運動方式也似乎較為落後，兩隊對抗的形態過於間接。

上述四種蹴鞠形式，都於唐代時期發明。它們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運動競技性甚低。可惜的是，自宋代（公元 960–1279 年）起，它們都成為蹴鞠運動中的主流模式，反而雙毬門競賽形式慢慢衰落。¹⁴ 這種發展趨向，與中國傳統蹴鞠運動走向衰亡，實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三）唐人蹴鞠的風氣

作為唐代流行的球類運動之一，蹴鞠頗受唐室君主歡迎。唐文宗（李昂，公元 809–840 年；公元 826–840 年在位）喜歡觀看角抵、蹴鞠；¹⁵ 唐僖宗（李儂，公元 862–888 年；公元 873–888 年在位）則「好蹴鞠、鬥雞。」¹⁶

唐代民間蹴鞠風氣亦盛。據唐人康駢（生卒年不詳）所撰《劇談錄》的記載，有一位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在行經長安城勝業坊北街時，遇上一群正在蹴鞠的「軍中少年」。剛巧其中一位少年把鞠踢到那位少女的身邊，少女即時二話不說，便把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少女出神入化的蹴鞠技巧，吸引了不少途人駐足觀看，而且人數越來越多。¹⁷ 在這個故事中，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故事提及「軍中少年」在長安城勝業坊北街蹴鞠，證明當時蹴鞠風氣非常盛行，參與人數眾多，故此長安城內到處可見人民蹴鞠的情況，蹴鞠運動並不局限於蹴鞠場內進行；第二，由於進行蹴鞠活動的是「軍中少年」，可見唐代蹴鞠與軍事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它甚至有可能是軍事訓練項目之一，故深受「軍中少年」歡迎；第三，在長安城內，隨便一位少女都能把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證明當時民間有大量善於蹴鞠的婦女。這也反映了蹴鞠深受唐代平民百姓的歡迎，這種體育活動沒有性別及年齡的限制，因而吸引廣大民眾參與其中，促使它成為唐代流行的球類運動之一。

12 王維：《寒食城東即事》，載常法寬編著：《圖說中國古代足球》，頁 146。

13 張寶強：〈試論唐代體育文化的創新精神〉，載國家體育總局文史工作委員會編：《體育文化導刊》，2007 年第 7 期（北京：國家體育總局文史工作委員會，2007 年 7 月），頁 96。

14 林伯原著：《中國古代體育史》，頁 223。

15 《舊唐書》中載：「開成四年（筆者按：公元 839 年）二月戊辰，幸勤政樓觀角抵、蹴鞠。」見劉昫等撰：《舊唐書》，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十七下，本紀第十七下，〈文宗下〉，頁 577。

16 司馬光撰，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第九冊（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卷二百五十三，唐紀六十九，〈僖宗惠聖恭定孝皇帝上之下〉，頁 8221。

17 康駢撰：《劇談錄》，載徐凌雲、許善述點校：《唐宋筆記小說三種》（合肥：黃山書社，1991 年），卷上，〈潘將軍失珠〉，頁 6。

除了一般平民百姓，唐代文人也多喜歡蹴鞠。杜甫（公元 712–770 年）詩《清明》中有詩句謂：「十年蹴鞠將雛遠，萬里秋千習俗同。」¹⁸ 說明杜甫年青時有一段長時間熱愛蹴鞠運動，也指出蹴鞠在唐代文人雅士的生活圈子中頗為流行。在統治階層內，部分官員對蹴鞠也趨之若鶩，如《新唐書》〈薛仁貴傳〉中就記載薛仁貴（即薛禮，公元 614–683 年）的孫子薛嵩（？–公元 773 年）「奏為檢校刑部尚書，相衛洛邢等州節度使。……初，嵩好蹴鞠。」¹⁹

（四）蹴鞠的東傳

與擊鞠相像，唐代蹴鞠也對古代東亞地區的體育發展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舊唐書》〈高麗傳〉中載：「高麗國（筆者按：指高句麗國，公元前 37–公元 668 年）人好圍碁、投壺之戲，人能蹴鞠。」²⁰ 可見在唐代時，蹴鞠這種球類活動早已東傳至高句麗。而「人能蹴鞠」一句，更說明該國人民普遍懂得蹴鞠之道；也說是說，蹴鞠在高句麗國內，是一種頗為流行的球類運動。

日本古代也流行蹴鞠運動，這是日本學習盛唐文化的結果。日本古書《游庭秘抄》引據《蹴鞠口傳集》云：「蹴鞠者，起自蒼海萬里之異域，遍于赤縣九陌之皇城。」這裡的「蒼海萬里之異域」，是指中國唐朝；而「赤縣九陌之皇城」就是日本。另一部日本古籍《蹴鞠九十九個條》更明確指出：「鞠，始於大唐。」足證日本古代蹴鞠運動源於中國。²¹ 《日本書記》在皇極天皇（公元 642–645 年在位）條下記載了日本「大化革新」的領導人物藤原鎌足（即中臣鎌足，又名中臣鎌子，公元 614–669 年）與中大兄皇子（即天智天皇，公元 668–671 年在位）於公元 644 年（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在奈良法興寺蹴鞠的情況。當時中大兄皇子還因蹴鞠過於用力，鞋子因而脫落。此外，藤原鎌足與中大兄皇子二人還曾向當時著名的學者南淵請安（生卒年不詳）請教學問。²² 南淵請安是日本飛鳥時代（公元 592–710 年）的學問僧，他曾跟隨「遣隋使」小野妹子（生卒年不詳）到中國留學，在中國居留凡三十二年，除了見證隋朝（公元 581–618 年）的滅亡外，更目睹唐朝開國以至走向盛世。南淵請安對唐代文化有深厚認識，也是「大化革新」運動的顧問之一。²³ 藤原鎌足與中大兄皇子熱衷蹴鞠運動，相信與南淵請安不無關係。日本「大化革新」之目的，為盡量吸收盛唐文化，作為唐代體育文化產物之一的蹴鞠運動，當然會藉此東傳至日本。²⁴

18 杜甫：《清明》，載常法寬編著：《圖說中國古代足球》，頁 147。

19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第十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一百一十一，列傳第三十六，〈薛仁貴傳〉，頁 4144–4145。

20 見劉昫等撰：《舊唐書》，第十六冊（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一百九十九上，列傳第一百四十九上，東夷，〈高麗〉，頁 5320。

21 張寶強、陳小龍、魯江：〈唐代中外體育文化交流及其歷史意義〉，頁 453。

22 林伯原著：《中國古代體育史》，頁 265。

23 葉渭渠著：《日本文化通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76–77。

24 林伯原著：《中國古代體育史》，頁 265。

(五) 結 語

中國蹴鞠固然有源遠流長的歷史，但唐代蹴鞠的發展，無疑為中國古代足球運動帶來盛世，值得我們注意。氣鞠、毬門的出現，強化了蹴鞠運動中的競技元素，使蹴鞠比賽更加可觀。白打雖然不是一種良好的運動競技模式，但它支配了宋代以後中國蹴鞠運動的發展，在中國古代足球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這不得不說是唐人的功勞。

唐代蹴鞠東傳至朝鮮半島及日本，無疑是盛唐文化東傳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蹴鞠運動反映了中國古代物質文明的真實面貌，而此一球類運動在古代東亞地區內發揚光大，更進一步說明了盛唐文化的巨大影響力。從這一角度來看，研究中國傳統體育活動及其文化意涵，實有助了解古代東亞地區內的文化交流，絕對是一個別具意義的歷史學課題。

❖ 體育史研究 ❖

世界史視野下的中國體育史—— 評介徐國琦 (Xu Guoqi) 的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布琮任
德國海德堡大學

在「區域整合 (Regional Integration)」和「全球一體化 (Globalization)」議題相對熾然的今天，跨學科研究 (Inter-disciplines) 逐漸成為文化討論 (Cultural Studies) 的熱點。體育史作為文化研究的新興顯學，以全球化視野對其作出各種多元多樣的開拓與探討 (Discourse on Globalization)，亦慢慢成為一種新派學風與學術潮流。事實上，體育作為一種「獨特文化」(uniquely effective culture)，¹ 它本身已是一種無區域、無種族、無排斥、無障礙的文化載體 (cultural medium)，所以要以世界史視角管窺不同國度的體育文明，相對於其他領域而言，是能較輕易找出其共同性、連接性與整合性的。

然而，我們亦需要特別留意世界史視野的兩面性。Nicoloa Yeates 早在 2001 年已對世界史論述提出一種「二元解讀 (Binary Interpretation)」，他認為單元性地正面評介「世界趨一」這些機遇是不切實際的。只因全球化現象亦具有「一體化專橫 (Despotism)」和「一體化獨斷 (Arbitrariness)」的反面評析，² 換言之，要妥善利用全球化的研究概念，便需要充份瞭解學科與學科；意識與意識；理論與理論；甚至是概念與概念之間的矛盾、衝突、對立與共融情況，否則便難以正確判斷全球性文化現象的利弊和優劣。

徐國琦 (Xu Guoqi) 雖然在 *Olympic Dreams: China and Sports, 1895-2008* 中指出他是利用國際化論述 (Internationalization) 的梗概，然而，他亦不免觸及到 Nicoloa Yeates 所倡說的「二元世界史」視野，從東西體育的分流 (Divergence)、合流 (Convergence)、傳染 (Contagion) 與體系 (System)，藉以窺視中國體育史近百年來的整合與發展。有別於傳統的體育史論述，徐氏認為近世中國體育的改變是可以從多種文化角度作出詮釋，而它的脈絡某程度上亦是建基於「挑戰 (Impact)、回應 (Response)、迥異 (Discrepancy)、接軌 (Assemble)」的理論框

1 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43.

2 Nicoloa Yeates, *Globalization and Social Policy* (London;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2001), pp. 1-9.

架。這種互動模式絕對不是單元單向 (Monotony)，反之是隨着社會與國際形勢的變化繼而變得互動多元 (Multidimensional)。事實上，隨著歐美體育文化群起風湧地進入東亞各大文明，中國的體育發展自晚清以來已開始與世界接觸；體育活動的種類、訓練模式、甚至是它的現實意義，亦開始與帝國主義、國際政局、民族自強等議題相輔掛勾。

由於歐美霸權在十九世紀以降大舉東進，亞洲各國開始苦思自強變革之法藉以救國救民。清 (1644–1912) 季知識分子除了鼓吹「以夷制夷」、「仿效西法」的主調外，部份學人如張之洞 (1837–1909)、嚴復 (1854–1921)、陳天華 (1875–1905) 等不時對國民的體格、體質與訓練有所要求。中國體育不僅是遊藝投壺、博奕騎射，它的功能開始轉化為與國家存亡息息相關的「救國工具」。按照徐氏的說法，晚清體育思潮之所以出現這種根本性的轉變，無疑是和當時的西力東漸有關；然而，若全盤性地把中國體育的變革歷史「歸咎」於歐美力量亦有欠公允，只因我們不能否認，自強思潮在傳統士大夫的憂患意識中應運而生，亦是改變華夏體育功能的重要元素之一。

體育不僅是變法圖強的重點，它亦是革命成功的關鍵。孫中山 (1866–1925)、秋瑾 (1875–1907) 等革命志士在 1912 年前後便相繼鼓吹國民應該強健體能、投身革命、繼而推翻滿清的荒腐帝制。在革命聲音的渲染下，體育文化便沾上一絲轟烈的民族主義與色彩，體育不再單純是一種競技，亦不只是一種自保，在革命鬥士眼中，它也能轉化為推倒腐朽政權的一種條件。誠然，體育功能在中國出現「變革」只是東亞世界的例子之一。在世界史的視角，世界任何民族在國難當前時幾乎無不深感「健體奮鬥，強國保種」的大道理，他們試圖解答國家何以陷入危機，並且尋找擺脫問題的出路；³ 在民族受到欺侮、國家需要更新的時代，透過體育來促令國民自我強化，頓然成為國家富強的重點方案。

及至二十世紀中葉，新中國在戰火中建立，她的國際地位亦在二次大戰以後火速冒升，國勢亦相對性的趨向穩定。經過了漫長的戰火歲月，以民族主義主導的尚武概念逐漸淡化，熱情激進的「體育救國」亦隨之冷靜平和。中國領導層明白到近代國際社會所追求的不僅是領土、經濟上的領先，體育亦可以視為一種獨領群雄、展示國家柔性實力 (Soft Power) 的途徑。在新世紀的國際舞臺上，體育是一種可以拉近外交關係，推動世界和平的催化劑。要進步、要開放，便需要依賴體育活動所潛在且驚人的力量作出突破，從而驅使不同民族加深認識、促進多邊多方的國際交流。總而言之，就中國近百年來的體育發展來說，體育這種文化載體與時代世局的關係不但是無以分割，它的性質亦是隨著環球變化而屢次轉營、改造、進化和更新的。

此外，徐氏亦從體育項目的本體性質探討中國體育的特殊性。誠然，有關「體育」這種載體，Adrian Smith、Dilwyn Porter 與 Jacques Barzun 早已對它作出解讀，他們指出，要瞭解一個族群的核心文化價值 (core value)，便需要從它的體育文娛入手。⁴ 徐氏傳承了西方學人的說法，強調中國悠久深遠的體藝文化 (Chinese martial arts and physical exercises) 正是這個

3 Pamela Kyle Crossley, *What is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8), p. 5.

4 Adrian Smith, Dilwyn Porter (eds.), *Sport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Post-war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4), p. 2; Jacques Barzun, *God's Country and Mine: A Declaration of Love Spiced with a Few Harsh Words* (Boston: Little, Brown, 1954), p. 159.

想像社會 (Imagined society)⁵ 的最有效反射 (Reflection)，這種反射不僅有助外來民族認識中國 (Perception by others)，亦是中國人尋求個人身份認同 (National identity) 的重要線索。因此，體育史不但是一部多采多姿的社會文化研究，也是一門涉及國族文明的立體學科。

作為近現代體育事業的一種榮耀、尊重與認可，奧林匹克運動會 (Olympic Games) 在二十一世紀的象徵意義愈趨重要。中國要在政治、經濟領域上突出自己、融入世界，便需要依賴此項體壇盛事來「自強振奮」。二十一世紀的「自強」不再是十九世紀末的自救與自保，現在我們所希望的「自強」是透過各項體壇競技衝出世界、藉以向不同國度展示光輝的成就與表現。徐氏雖在 2008 年 8 月 8 日 (奧運開幕典禮) 前成書，但他也能預見奧運成功在某程度上亦能帶領中國攀上另一高峰；為廣大國民帶來一種正面狂熱 (Passion)；並且拉近世界趨一的大同夢想 (One World, One Dream)。但徐氏亦持平地分析中國體育要在意識型態上達到真正的開花結果，絕對不能僅僅侷限於鋪天蓋地的宣傳口號、金牌榜上的卓越領前、與及奧運健兒的驕人紀錄；退而思之，國民思想的開放、體育思潮的普及、政治與體育的正常關係方是中國體育文化進步發展的關鍵因子。在全球化的視角下，體育史絕對能夠和當世政治議題整合討論，而政制開明與否便是體育發展是否健全的契機；徐氏清楚指出，縱然中國健兒在歷屆奧運會上的表現燦爛異常、光華畢現，但我們亦要理解中國與「他者」在政制上存在的落差與分野。要真正在全球化視角下與世界體壇接軌，中國體育發展的道路依然是修遠漫長。

5 有關想像社會的討論，詳參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91).

❖ 常州研究 ❖

花鳥正宗：惲壽平與常州畫派

周佳榮

香港浸學大學歷史系

一、常州畫派的淵源和脈絡

三百多年前，在江南文化古城常州，有一個以創新為宗旨、以「沒骨畫」為主要風格的花鳥畫流派悄然崛起，這便是歷史上極富盛名的常州畫派。它對中國畫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其聲望直至今日仍然飲譽海內外。「沒骨」是中國畫技法名，即不用墨線為骨，而直接以彩色或水墨描繪物象；其法始自五代後蜀的黃筌，他畫花勾勒較細，著色幾乎不見筆跡，因而有「沒骨花枝」之稱。在中國繪畫史上以地名為標誌的，有湖州竹派、松江畫派、新安畫派等，而以常州畫派為殿軍。此派亦有人稱之為毗陵畫派或武進畫派，毗陵和武進都是江蘇常州的古地名。

據統計，自南朝至清末，常州有著名畫家近二百人，計齊、梁 6 名，唐、宋 15 名，元代 4 名，明代 14 名，清代名家輩出，多達 158 名。在常州畫派創始人惲壽平（南田）以前，歷代常州主要的畫家，包括：南北朝梁的蕭賁、蕭祐和南唐的董羽；宋代的吳炳、居寧、許迪、曹仁希、秦友諒、於春言、徐友、錢君用、堵信卿等；明代的孫隆、孫瓏、金則柔、陳該、陳端甫、唐竹窗、唐獻可、顧仕、謝瑩、寂澄、薛祚昌、魏常明、莫執中、惲厥初等人。惲壽平少時曾師事惲厥初。

常州畫派的形成，除了惲壽平本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外，常州的歷史文化淵源實亦為重要因素，另外兩位重要成員亦不可忽視，一位是山水畫家惲向（香山），另一位是花鳥畫家唐宇昭（半園）。常州畫派代表人物眾多，潘茂著《常州畫派》（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2002 年）作了這樣的界定：「惲南田是主帥，惲香山、唐半園是先驅，唐匹士是勁旅，馬扶曦、范芷庵、鄒黎眉、章佩玖、張子畏、陸慕雲是後援，而繆東白、蔣南沙、華秋岳、鄒小山則為異軍。」

二、常州畫派的先驅人物

惲向（1586–1655 年），原名本初，字道生，號香山，武進人。初為諸生，好詩古文辭，博學有時名。崇禎末年舉賢良方正，授內閣中書，不就，棄官歸里。工山水，早歲學董源、巨然，懸筆中鋒，骨力圓勁，用墨濃濕，縱橫淋漓，自成一派。晚年惜墨如金，癡筆於倪王

之間，妙合自然。

惲向的傳世作品，有《春雨迷離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館）和《董巨遺意圖》軸（現藏青州市博物館）；《惲本初山水冊》，1931年上海國光社影印出版。著有《畫旨》四卷，已佚，僅存題畫論畫若干則，收錄於《玉幾山房畫外錄》之中。

常州畫派的另一個先驅人物唐宇昭（1602–1672年），是唐順之玄孫，父獻可為明太學生，多才藝，能詩善畫工書，擅鑒別古書畫器物，收藏頗豐。唐宇昭幼承家學，與其弟宇量均為崇禎舉人，時人並稱「二難」，明亡後與其弟偕隱。有司迫上公車，中途逃歸，在宅西建園，取名半園。園以山池勝，環立巨石，澗道縱橫繚曲，兩岸似懸岸峭壁，架石橋曲曲相通，穿山而過，縈繞於回廊邊，是常州名園之一。殿以廳事，名四並堂，兄弟夫婦，逍遙翰墨於此。康熙元年（1662年），唐宇昭邀惲格（壽平）及常熟王翬（石谷）二青年館於其中，切磋畫藝，並盡出家藏前人書畫給二人揣摩，後惲格、王翬均以畫名於時。

唐宇昭工詩詞，著有《擬故宮詞》、《半園外史稿》（又名《半園詩》）、《行身鏡》、《月午詞》等集，及南戲劇本《桃花笑傳奇》等。其妻同邑于氏亦工詩詞，著有《雙燕樓草》及《半園唱和草》。

唐宇昭的兒子唐于光（1620–1690年），工花卉、山水，尤長於蓮，與惲格齊名，當時有「唐荷花、惲牡丹」之譽。傳世作品有《紅蓮圖》軸（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及《墨荷圖》軸（現藏上海博物館）。其母精於品茗，宇昭奉命採製，如是十餘年，著《茗理》一書。

三、惲壽平生平和藝術成就

惲壽平（1633–1690年），江蘇武進（今常州）人，初名格，字壽平，後以字行；復改字正叔，號南田，又號雲溪外史、白雲外史、東園客等。畫界中人通稱他為惲南田。他少時跟從兩位堂伯父學畫，清兵入關後，隨父惲日初隱居浙東天台山中，曾參加抗清義軍。誓不應舉，居家侍父、讀書、學畫及種田；家貧，以賣畫為生。順治十二年（1655年），與王翬（石谷）合摹倪雲林《漁莊秋色圖》；康熙元年（1662年），與王石谷訂交與毗陵（常州）唐宇昭（半園）之四並堂，惲、王合作《山水圖》卷。

康熙七年（1668年）惲壽平三十六歲時，客杭州，渡錢塘，遊山陰（紹興），泛舟鏡湖，探禹穴，作《禹穴古柏圖》並識；是年在杭州東園高雲閣作《仿古山水冊》十二開，均有題識。嘗自號東園客，過去一般人都認為東園在杭州，其實常州也有個東園，即今「近園」。東園原為惲壽平堂伯父、明代陝西布政使惲厥初的別業，後來典給里人楊兆魯經營，改名近園，曾邀請王石谷、惲壽平等人到近園吟詩作畫。

惲壽平原先能畫山水、花卉，畫山水比花卉多，遇上王石谷之後，覺得石谷筆意極相似，將以此擅天下名，自遜不如，於是作花卉寫生。自稱學北宋徐崇嗣沒骨法，一洗時習，獨開生面，成為一代寫生正宗。按：徐崇嗣學效黃筌，所作的花卉只用彩色畫成，名「沒骨圖」，後人遂稱這種畫法為「沒骨法」。

惲壽平的畫作中多小品，相信這與他要靠賣畫維持生計有關，銷路雖然不錯，但也有滯銷的時候。因家境較清貧，時常要考慮家人的溫飽問題。雖然如此，惲壽平的創作態度是很認真的，一絲不苟，全神貫注於書畫藝術上，絕不粗製濫造。加上性情落拓雅尚，遇知己可數月為之點染，非其人則視百金如土芥，不市一花片葉。遨遊數十載，而貧窮如故。由於他

不辭疲倦，勤奮創作，終致積勞成疾，在杭州作畫賣畫時溘然長逝。生平除繪畫外，著有《甌香館集》、《南田詩草》、《惲南田畫跋》、《畫鑒評》、《壽平尺牘》等。

四、惲壽平以「三絕」名世

惲壽平的交遊主要是常州唐半園、常熟王石谷、太倉王時敏三家和京口笪重光，以及杭州好友莫雲卿、洪昇、諸匡鼎、王丹麓等。常州在清代曾有「詩國」之稱，能詩文者數百人，知名者如邵長蘅、楊兆魯、莊天錦、董舜民、楊宗發、唐惲宸等不下數十人，均與惲壽平有詩文往來。惲壽平詩格超逸，書法遒雋，畫筆生動，時稱「三絕」。他之所以能夠成為清初六大畫家之一，這與許多詩文書畫朋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還有一事可提的，就是惲壽平曾在竹片上刻自作書畫，而成臂擱（又稱秘閣），開常州竹刻之先河。

惲壽平的畫，山水、花鳥兼擅。山水畫無論題材或內容都很廣泛，形式體裁多樣，畫幅上題詩跋文多而且妙，歷來評價很高。其花鳥畫把對物「寫生」與創作「寫意」有機地結合起來，以「真而且妙」、「形神兼備」為準則，別開生面地開創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沒骨花卉技法，形成了獨樹一幟的常州畫派。

惲壽平所創的常州派花卉畫，又稱惲派花卉，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是不用純墨，全用色彩加入水分和脂粉調合後，直接用筆揮寫，以之描繪所要表現的花卉，使既真實而又生動，達到形似與神似緊密結合的效果和境界。第二，是擴大題材範圍，除了一般常畫的梅、蘭、竹、菊、牡丹、荷花之外，還有芍藥、天竹、芙蓉、玉蘭、月季、薔薇、雞冠、錦葵、鳳仙、紅蓼、杜鵑花、虞美人、秋海棠、蝴蝶花、蠶豆花、牽牛花、石榴，以及扁豆、芋艿、冬筍、松子、毛栗子等，總共有幾十種之多。第三，是構圖章法以折枝寫生為主，極少取全株式，而是挑選其中最生動傳神的一兩枝、一兩種或一兩束，充分表現出這些花的色、態、光、韻，使之盡善盡美。第四，是設色非常講究，採用比較淡雅的淺色，一改前人和時人穠艷的習氣，《三色菊圖》是南田沒骨花卉寫生的代表作。

總之，惲壽平的沒骨花卉以形寫神，形神兼備，是劃時代的創作。其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堅持對物寫生和巧施寫意的手法，不用墨或色勾框，而直接以色彩與水、粉調合揮寫，做到「為花寫生」和「與花傳神」，達到既真且妙的境界。學習惲氏這種畫法的，有他的侄孫惲馨生、外甥張子畏；得意門生之中，著名的有馬元馭、范廷鎮、鄒黎眉等。後來還有惲挺生、惲冰、惲標等數十人，可見其影響深遠。

五、惲氏族裔畫家和門生

惲壽平的族人中，書畫家不下五十餘人，包括以惲冰、惲珠為首的女畫家十數人，著名的有惲源濬、惲毓嘉等。惲源濬（1692-1763年），字哲長，號鐵簫老人，曾任天津縣丞。他在詩書畫三方面都全面地繼承了南田的創作方法，花卉作品秀雅清麗，葉片尖削而有特色，喜歡在畫面上題詞、題詩，以表達其繪畫思想。惲源濬之妹惲蘭溪，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女畫家，她的作品喜歡以正面花朵示人，又著意於描寫物與物之間的關係。

惲毓嘉（1857-1919年），字孟樂，號蘇齋，是惲派書法家的代表。光緒十八年（1892年）進士，與蔡元培、唐文治同科，授翰林院編修，曾任福建延平府知府。他的書法一絲不苟，

雅俗共賞，深受歡迎，光大了惲氏書法藝術。民國初年在上海賣文鬻書，並與汪洵、吳昌碩等組織「海上題襟館書畫會」。

惲壽平的學生之中，繪畫成就較高的有馬元馭和范廷鎮。馬元馭（1669–1722年），字扶義，號栖霞、天虞山人，江蘇常熟人。出身書香世家，好讀書，嗜酒，喜歡用水墨作畫，墨花橫溢，逸趣飛翔。他將家學帶入惲派沒骨畫的風格之中，取材廣泛超過南田，並且形成自己的面目，對清初花鳥畫的發展起了承先啓後的作用。馬元馭的子女馬逸、馬荃大體都能繼承南田遺風，內容和景象完整而宏闊；馬元馭在常熟一帶有眾多門徒，將南田畫風廣泛傳播開來。

順帶一提，康雍時期的蔣廷錫（1669–1732年），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工寫生，因與馬元馭切磋畫藝而浸染了南田之法。南田畫風能夠引入宮中，逐步成爲宮廷花鳥畫的重要表現形式，蔣廷錫擔當了重要的角色，其次則是惲蘭溪的丈夫鄒一桂（1688–1772年）。

惲壽平的另一個弟子范廷鎮，字子安，號凍亭、鹿疇，有較多作品傳世。他的沒骨花卉甚似南田，用筆綫條蒼率直接，其書法及畫石的皴法、苔法皆仿南田，在南田眾弟子中最能詮釋其師的高況氣質。

【參考書目】

- ◆ 承名世主編《惲壽平書畫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 ◆ 《惲壽平精品集》，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
- ◆ 李一、張曉凌、潘雪梅編《惲南田畫風》，重慶：重慶出版社，1995年。
- ◆ 蔡星儀著《惲壽平研究》，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0年。
- ◆ 葉鵬飛著《南田遺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 ◆ 蔡星儀著《惲壽平》，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
- ◆ 楊建峰編《惲壽平》上、下卷，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9年。
- ◆ 潘茂著《常州畫派》，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2003年。
- ◆ 溫肇桐著《清初六大畫家》，香港：香港幸福出版社，1960年；香港：香港崇明出版社，1970年。
- ◆ 張書珩編《四王吳惲繪畫藝術》，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5年。
- ◆ 盧輔聖主編《中國花鳥畫通鑑 13·寫生正宗》，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年。
- ◆ 潘耀昌編著《中國歷代繪畫理論評注·清代卷（上）》，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9年。

❖ 常州研究 ❖

毗陵多閨秀：清代常州才媛

丁 潔

香港浸學大學歷史系

一、常州才媛輩出的原因

常州歷來才媛輩出，修養甚高，在清代婦女文藝史上佔有重要席位，可舉得名人甚多，例如常州畫派中多閨閣畫家，毗陵詩派中多閨閣詩人，甚至當時已有揚名國外的女書法家，詩書畫都有不少傳世之作。在近代中國，常州更是新女性誕生之地，包括第一代女報人陳擲芬、第一位女學者陳衡哲等，均其佼佼者；有「一代才女」之稱的陸小曼，也是常州人。

紀玲妹著《清代毗陵詩派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年）指出，「清代閨閣詩人的分佈有明顯的地域性特徵，以江、浙兩省為主，尤其是江南最為集中。……常州歷來人文薈萃，清代學術文化尤為繁盛。」扼要而言，毗陵閨閣詩人出現家族性特徵有以下幾個原因：第一，是重家學傳統，形成閨閣詩人的家族性特徵；第二，是注意母教的傳統，造就較多女子成才；第三，是閨房唱和，擴大了閨閣詩人的影響。此外，常州文人較開明的態度，又褒獎婦女從事創作，在在說明了「毗陵多閨秀」並不是偶然的現象。

二、常州閨閣畫家群像

著名畫家惲壽平在歸納和總結宋人技法的基礎上發展了花鳥畫的沒骨法，自出現後即成為清代花鳥畫壇的主流。李湜著《明清閨閣繪畫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指出：「不僅眾多的男性畫家如蔣廷錫、羅聘等習此畫法，就是深居閨中的，尤其是惲氏後裔惲冰、惲懷娥、惲如娥等女性畫家們，也紛紛以惲氏沒骨法進行花鳥畫的創作。」

惲冰，字清于。活動於康熙中期至乾隆初期，生卒年份不詳。有人說她是惲壽平的女兒，也有人說他是惲壽平家族中的曾孫惲鐘嶺次女，據《武進縣志》所載，則後一說較為可信。惲冰自幼敏於詩文，潛心於花鳥畫創作，逼真寫實而又生動傳神，存世作品頗多，有《藤花翠鳥圖》、《蒲塘秋豔圖》、《南山佳色圖》等，時人把她和江蘇常熟人馬荃並稱為女性花鳥「二絕」。在惲氏族裔眾多的畫家之中，惲冰的聲名最高，傳世作品最多，形式風格亦最豐富。她的花卉畫雖無突破性的發展，但畫風細膩秀美，充份突顯了女畫家的特質，乾隆帝在看過她的畫後還題詩嘉獎。

惲珠（1771–1833年），字星聯，號瑜浦，一作珍浦，晚號蓉湖夫人，自稱毗陵女史。篤女子理學，人稱「女中之儒」。陽湖人。她是惲冰的侄女，巧於織繡和繪畫，又工詩文，詩、繡、畫並稱「閨中三絕」。其夫完顏廷璐為滿洲鑲黃旗人，官泰安知府，死於任上，她撫養諸子，課以實學，皆有成就。

惲珠繪《海棠蛺蝶圖》點染生動，設色鮮活明麗，畫面又簡潔精緻，頗具南田寫生風貌。著《紅香館詩草》，並廣搜清代女子之作，輯成《國朝閨秀正始集》二十卷刊行，選清代婦女933人的詩作1700多首。而四方投寄者仍多，全部予以收錄，病篤，以所手訂命孫女妙蓮編成《續集》十卷及《補遺》一卷，共收593人的詩作1229首。又輯列女傳《蘭閨實錄》六卷，以歷代具有孝行賢德、智略才華的婦女為內容；此外，還校刻惲日初遺書及《李二曲集》二十六卷。惲珠從妹惲璠，亦善寫生。

惲懷娥，號紉菊，南田裔孫女，適宛平曹氏，最擅長以惲壽平的沒骨花卉法繪花果，所繪掛畫尤受時人歡迎。其妹惲懷英，號南陵女史，適呂氏，自幼研習惲壽平的沒骨畫技法，頗有造詣，如《天中景映圖》（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花卉氣韻生動，畫風明麗活潑，甚得惲氏靈秀天趣之美。此外，還有惲蘭溪、惲青、毛周（惲冰的孫女）等，她們都在題材上專繪花鳥畫，成為清代畫壇上的閨閣花鳥畫創作群體。

常州閨閣畫家之中，還有江蘇武進人左昂的三個女兒錫惠、錫璇、錫嘉值得注意。大女錫惠，字晚香，嫁歸安姚子湘，善人物花卉，均超妙入神。二女左錫璇（1829–1895年），字小桐，號芙江，嫁同邑袁績懋為繼妻。工詩詞，善書畫，其畫家惲壽平，花卉及竹石均秀逸有致。咸豐年間，太平天國興軍之時，其夫死於福建，當時她年僅三十，仍留居閩嶠，畫荻教子，有賢母風。著有《紅焦碧梧館詩詞集》。三女左錫嘉（1830–？年），字韻卿，字小雲，號浣芬，晚年別署冰如。工繡譜，喜詩書，亦善畫花卉，學惲壽平沒骨法，設色鮮麗，筆力適勁，自成一家，在三姊妹中最為出色。嫁華陽曾泳為繼室，咸豐年間其夫死於太平軍興之時，她扶柩歸葬，並繪《孤舟回蜀圖》。性至孝，有大家孝女之稱。詩作多幽憤感慨之語，而渾厚處則直逼漢魏。著有《冷吟仙館詩稿》、《詩餘文存》等。

三、毗陵閨秀的詩詞作品

還應特別注意的，是清代毗陵閨閣詩。惲珠編《國朝閨秀正始集》及《續集》，專收清代閨秀作品。據《歷代婦女著作考》，常州僅武進、陽湖二縣的詩詞集，在清代便有一百二十六種；《江蘇藝文志》常州卷收錄清代武進、陽湖二縣閨閣詩人，達一百四十七位之多。論者指出，這是由於母教的傳統，促成女子成才；而常州文人對婦女創作的褒獎，更促進了閨閣詩的繁榮。

清代常州才媛輩出，正所謂「毗陵多閨秀」，她們當中有的不僅詩詞出眾，在書畫方面也有造詣。例如張琦的四個女兒張縉英、細英、綸英、紈英均能詩，三女張綸英擅長魏碑，堪稱奇女子，其作品甚至遠傳國外，日本、高麗諸貢使皆購其書以歸。凡此皆足以說明，常州在清代女學史上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清代毗陵詩人中，由於血緣關係和婚姻關係，出現了姐妹詩人、母女詩人、夫妻詩人、妯娌（兄弟之妻的合稱）詩人及姑嫂詩人等，當中最為著名的是張氏四女和張紈英的四個女兒王采蘩、采藻、采芹、采蘋。張縉英有《澹菊軒初稿》四卷，張細英有《緯青遺稿》，張綸

英有《綠槐書屋詩》三卷，張紈英有《餐楓館文集》三卷和《鄰雲友月之居詩集》四卷。四姐妹的詩集，還冠以《陽湖張氏四女集》合刻；時人評張英纏綿悱惻，縑英幽雋、綸英矯健、紈英和雅，各得張惠言之一體。王氏四女，分別有《慕伏師班之室講詩集》、《儀守齋詩存》、《春暉草堂詩》和《讀選樓詩稿》。王氏四姐妹都善詩工畫，尤以幼女王采蘋為閨中大手筆，其畫以花鳥為長，書法則篆、隸、楷皆精，年七十餘猶受聘於河督為女師，河督為刻詩草行世。

張氏四女與王氏四女

集稱	姓名（生卒年份）	簡介
張氏四女	張紈英（1792–1841年）	字孟媿，嫁常熟吳廷鈺；博覽經史，工詩詞，著《澹菊軒詩》、《澹菊軒詞》，輯《國朝列女詩錄》。
	張縑英（1795–1824年）	字緯青，嫁江陰章政平；著《緯青遺稿》、《緯青詞》。
	張綸英（1798–1844年）	字婉紉，嫁同縣孫劫；詩學魏晉，不屑為綺麗之語，有《綠槐書屋詩稿》；又工北朝書法，日本、高麗諸貢使都購置書法作品回國。
	張紈英	字若綺，嫁太倉王曦，早寡依弟而居；工古文篆法，善詩，著《鄰雲友月之居詩集》、《餐楓館文集》。
王氏四女	王采蘋	有《慕伏師班之室講詩集》。
	王采藻	有《儀守齋詩存》。
	王采芹	有《春暉草堂詩》。
	王采蘋	有《讀選樓詩存》。

四、女彈詞家程蕙英

清代同治（1862–1874年）、光緒（1875–1908年）間，有一位擅作彈詞的才女程蕙英，字蓮儷，武進人，在城內為女塾師。她的長篇彈詞《鳳雙飛》，初成四十回即紙貴一時，後增增五十二回，洋洋百餘萬言。程蕙英終生不嫁，其有《自題鳳雙飛後寄（女友）楊香畹》，詩云：

半生心跡向誰論，願借霜毫說與君；
未必笑啼皆中節，敢言怒罵亦成文；
驚天事業三秋夢，動地悲歡一片雲；
開卷但供知己玩，任教俗輩耳無聞。

作者的心意溢於言表，道出了那個時代的知識女性在種種限制之下，因未能在社會上有所作為而抑鬱難平，作品之中不免流露著淡淡的哀愁。《鳳雙飛》曾三易其稿，歷時二十載，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完成，或謂書中的真大雅即作者隱以自寓。卷末自題：「易稿三番比最優，枯毫落盡漸成丘；應逢福地為書篋，慰我辛勤二十秋。」意頗自負，或謂其結構遣詞遠在《天雨花》、《再生緣》之上。程蕙英工詩，有詩集《北窗吟稿》，純乎閱世之言，亦非尋

常閨秀所能。其《鳳雙飛》在入民國期間由上海江左書林於 1923 年石印，有瑞芝室主人序。故事主要描寫郭凌雲、張逸少等的同性戀故事，作者從女性的角度，用「貞操」衡量男子，從而對傳統認為女性應該受男性擺佈的陳腐觀念作出反抗。譚正璧著《中國女性文學史話》（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4 年）強調程蕙英「狂放倜儻，無普通女子畏縮柔懦之氣。」

【參考書目】

- ◆ 俞劍華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 年。
- ◆ 李湜著《明清閨閣繪畫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 年。
- ◆ 王力堅著《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 年。
- ◆ 葉鵬飛著《南田遺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年。
- ◆ 潘茂著《常州畫派》，長春：吉林美術出版社，2003 年。
- ◆ 羅我白、史洪等著《常州史話》，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 年。
- ◆ 陳肅著《毗陵散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8 年。
- ◆ 戴伯元著《常州文史雜談》，南京：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1988 年。
- ◆ 常州市文化局編著《常州文化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年。
- ◆ 紀玲妹著《清代毗陵詩派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年。
- ◆ 鮑震培著《清代女作家彈詞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8 年。
- ◆ 劉詠聰主編《中國婦女傳記辭典·清代卷》，悉尼：悉尼大學出版社，2010 年。

❖ 院校巡禮 ❖

樹仁大學歷史系 榮譽學士學位課程簡介

區志堅 羅玉芬
樹仁大學歷史系

（一）引言：樹仁大學歷史系的宗旨和課程

樹仁大學（以下簡稱仁大）歷史系（以下稱本系）課程自 2005 年 9 月第一屆歷史學榮譽學士課程推出後，不斷改革和整理，希望提供一個適合二十一世紀中國大學生的課程。課程秉承本校創辦主旨——以發揚中國歷史文化為主，而改革主要希望能培養學生兼備「世界視野」及「中國情懷」均衡的、涵蓋古今歷史的學識、興趣及研究能力。未來的香港及中國的發展是要靠我們青年的新一代，除了堅實的歷史知識外，培養他們也關心現今之中國及國際事務，本系認為也應導訓同學們做好準備，以為未來中國發展上扮演角色。

原本的課程架構以一組（Field/cluster）完備的「中國史」科目為中心，輔以只有三科簡述式（Survey）的「世界史」組、四科基本的「史學本科」¹組、由一科「香港【通】史」²加兩科有關現代香港的經濟的「香港史」組和全是選修的通論式的、缺乏清楚設計以彼此配合的三科「中外關係」史組合成的。另有一「組」課程系列，似以個別教師興趣主導，卻和課程整體配合無多大關係的中史選修科。這些「組別」表面上「構成」了本系的歷史的課程，但彼此之間缺乏建構性的相互支援和配合，部分「組別」如「香港史」和「中外關係」的設計不週，欠缺主題。選修科目也沒有配合全體的考量，其實除中國史外，同學們必須修讀所有在中國史組內的斷代或分期史和「香港史」、「史學本科」，即是除了「史學經典」一科以外的所有科目。「中外關係」史組因為全是選修的，所以變得「可有可無」。「世界史」雖是必修的，但似只與「中國史」系列科目「並排」而行，彼此間並無「呼應」的考量或機制。整體而言，原本的課程是各「組」並列，彼此缺少契入或配合，是較為「鬆散」的。

改革的大方向（main thrust）是要把本課程的各「組」設計的目的和功能重新考量（re-consider）和釐訂（define），使它們能和作為核心課程（Core）的中國史組互相緊扣

1 「History as a Discipline」內有必修的「史學方法及理論簡介」、「史料學」、「史學史」和選修的「史學經典」等科。

2 「香港史」一科包括回歸前整個英國統治時期，所以是「通史」式的。

(interlock) 成爲一個近乎「有機的整體」(a “near-organic” whole)。此外，隨著「全球化」的發展、中國的開放政策及香港回歸，今天的中國已變成了能「穩定【或搖動】世界的關鍵力量」，³ 即使是歷史的課程設計和參考資料，也要與時俱進，而現代史科的內容更要真正能夠「鑑古通今」，使本系畢業生不但能掌握歷史，也對國家及世界的最新發展有充份的認識，以面對新社會的挑戰，待他們畢業後，擁有較強的競爭力，能夠更快、更精確地「掌握明日機遇」，⁴ 服務社會和國家。故本系除了培育學生將來成爲專業歷史學人外，也爲他們扮演領袖角色作準備。

本系課程改革的另一目標是回應近年香港教育改革的路向，緊貼社會需要爲辦學的前提。現時，有關新高中課程歷史科的轉變有兩方面：首先，部分傳統的歷史教學內容被納入新增的必修通識核心科目 (the core subject of liberal studies)；其次，餘下的傳統歷史課程經過修改後，改以導論形式給高中學生選修，當中以近代時段的歷史爲必修內容、當代歷史爲選修的專題研究科目。同時，新高中課程也增加了許多具有實務及技巧導向的新科目，與歷史科一同供給學生選修。基於這個教育改革的方向，愈來愈少歷史系畢業生從事純專業的歷史教學工作，爲了增加畢業生的就業能力，本系的課程也作出相關的調整，總括這個革新爲以下兩個重點：一、發掘及加強學生的「靈活處理問題的技巧」(portable skills)，如：培養學生搜集資料及處理問題方法、從事專題研究的一般原則、評論史事的觀點、分析事件的態度與視野、報告及應對的技巧，這些都是畢業生於現今資訊發達及服務型經濟社會模式中，所必要具備的條件。二、現行的高中課程設計清楚反映今天及未來社會急切需要具有「全人教育」特色的年青人 (all-rounded generation)，新增的通識核心科目及以近、現代爲中心的歷史科目正反映了這一點。因此，本系的課程改革的另一個重要目標是要裝備學生，使他們擁有多方面的技巧、全面的才能及對四周及時事的觸覺，即使他們畢業後選擇從事非教學的職業，也能在已有的裝備下踏足社會，甚至領導未來的發展。

(二) 課程設計：集「中國情懷」與「世界視野」成爲一個「有機的整體」

自 2005 年開始改革及重新整理的歷史系課程，主要以「中國情懷」與「世界視野」爲兩大發展方向。首先，透過對原有課程的增補及修訂，使所有給予本科學生修讀的科目，按其性質及授課目標，主要歸納爲「中國史」及「非中國史」，其下又分爲四個既獨立又互相聯繫的「群組」(clusters)，分別是「中國歷史」(Chinese History)、「世界歷史」(World History)、「中國與世界」(China and the World) 及「區域史」(Regional History) 系列。「區域史」系列更細分爲「區域史 A：中國地區」(Regional History A: Chinese Regions) 和「區域史 B：非中國的國家及地區」(Regional History B: Non-Chinese Countries & Areas)。在「非中國史」的部份，主要教導海外國家與中國歷史、發生事件的互動關係，並專注教導「非中國」諸國的發展經驗對中國發展有那些啓發，藉分析諸國改革失敗的原因，以說明這些因素作爲中國借鏡或值得參考的地方，而不如其他本地大學開辦「非中國史」的科目，多專注意教導列國

3 呂少群：〈看透歷史 掌握明日機遇——樹仁大歷史系系主任鮑紹霖〉，《大公報》，2010 年 1 月 8 日。

4 同上。

國內的歷史文化。其次，本學位課程也加入了「中國情懷」與「世界視野」的兩大元素，成為這個「有機的整體」的最終教學目標。我們希望藉此使學生得到全面的訓練，加強畢業生踏入社會的競爭力和能夠把握未來的機遇，並培養他們成為世界領袖的必要條件。本學系也包括：

（1）強化原有的課程特色

現今仁大歷史系的課程以「中國歷史」為本位，「世界歷史」為輔助。「中國歷史」的系列是核心「群組」。它一方面承傳了大學辦學的宗旨——延續及發揚悠久和豐富的中國文化；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日漸重要，學生有必要加深對國家的認識及了解，這樣才能面對及掌握未來的挑戰與機遇。為了達到這個教學目標，原有課程設計中的七個必修的中國歷史科目，經重新整理後維持不變，這包括「中國通史導論」(Introduction to Chinese History)，及多個朝代和斷代史，如「秦漢魏晉史」(History of Qin–Han–Wei–Jin Dynasties)、「隋唐史」(History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宋元史」(History of Song and Yuan Dynasties)、「明清史」(Histor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中華民國」(Republican China)和「1949年後的中國」(China Since 1949)，學生修讀這些必修科，必可加強同學們對國家的了解，並在中國歷史知識方面打下紮實的基礎，以培育「中國情懷」。至於原有的「世界歷史」系列，學生必須修讀三個科目，分別是「世界史至 1500 年的導論」(Introduction to World History to 1500 A.D.)、「近代世界」(The Modern World)和「當代世界」(The Contemporary World)。這個「群組」是希望讓學生不獨了解中西歷史發展的不同面貌，更希望培養同學們的「世界視野」。此外，本系仍保留了原有課程中的三個旨在訓練學生成為歷史專業人員的科目，這些科目分別是「史學理論與方法導論」(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Theories and Methods)、「中國史料學」(Study of Chinese Historical Sources and Materials)和「中西史學史」(Study of Western and Chinese Historiography)。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必修科目，不獨培訓歷史知識的專業人才，更希望裝備學生獲得必要的「靈活處理問題的技巧」。學生除了學習上述的技巧外，更藉此了解中國與西方對處理歷史知識的不同方法、態度及演繹技巧，使同學們能夠學習包容不同知識、掌握多角度的思維方式及擴闊學習視野，這些元素附合了現今急速多變的社會及世界需要。

同時，為了裝備學生應付「中國崛起」所帶來的挑戰，能夠及時把握事業發展的機遇，本系在原有課程設計的基礎上，作出了兩大方向的改動。首先，為了配合時代的不停演進，當代中國與世界歷史科課程不設時間性的下限，例如「中華民國」及「1949年後的中國」是從原有設計的「近代中國：晚清的衰落、改革和革命」(Modern China: Decline, Reform and Revolution the Late Qing Period)及「二十世紀的中國」(The 20th Century China)修改而成的。除了劃一「中國歷史」系列的分期標準外，即以政權為分水嶺，「1949年後的中國」更「開放」了時段的下限，鼓勵授課老師及同學留意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的最新發展。同樣地，「世界歷史」系列亦作出相同的修改。因應「全球化」的發展，海外的歷史學界已重新撰寫「世界歷史」，以 1500 年及 1900 年作為「古代世界」、「近代世界」及「當代世界」的歷史分期。因此，現行「世界歷史」系列的必修科目亦以這點為課程設計的目標。當中的「當代世界」，除了把原有設計的教導上限從 1945 年推前至 1900 年，與「中國歷史」系列一樣，為了達到相同的教學及學習目的，而不規定教學範圍涵蓋時期的下限。這個「開放」及「彈性」的安排，使整個歷史課程具有與時俱進及「有機性」的特色。

還有，爲了增加畢業生的競爭能力，歷史系開辦的「中國歷史」及「世界歷史」的兩個「群組」，也作出了革新。首先，給予二至四年級學生選修的「中國歷史」系列的科目，作出了少許變動。除了客觀的資源因素外，這個變動亦是基於建立及加強學生「中國情懷」的指導方向。主要的改動包括新增了「中國經濟史」(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y)、「傳統中國史：議題和爭論」(Issues & Controversi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y)和「近代中國史：議題和爭論」(Issues & Controversi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前者爲學生提供了導致今天出現中國現代化政策及成果的歷史背景；而後兩者則著重鞏固學生的「中國情懷」及思維方式。至於「世界歷史」方面，從必修科目中衍生了「世界大戰」(The Great Wars)及「近代西方經濟強國的崛起」(Rise of Western Economic Powers in Modern Times)。這樣的改動既回應及發掘學生對中國歷史以外的興趣，也給學生提供西方歷史的發展及經驗，使學生學習比較中外歷史的觀點及借鑑「非中國」國家興起的歷史經驗，藉此補充及加深學生對中國與「非中國」國家歷史的了解。

(2)「進取」的「中國與世界」橋樑系列

隨著中國與世界日漸緊密的聯繫，及中國在世界事務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課程改革的重心是開拓「中國與世界」的「群組」，以此作爲學生的選修科目。首先，將原有設計的「中外關係」(Sino-Foreign Relations)系列改爲「中國與世界」。其次，學系重新整理及命名原有系列內的三個選修科目。在原有的「中外文化交流」(Cultural Contacts between Chinese and Non-Chinese Civilizations)一科上，加設至1500年爲講授時間的下限；原有的「中外關係」(Sino-Foreign Relations)改爲「中國與歐洲在近代世界的構成」(China and Europe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World)，以1500-1900年爲時限；而「中國與近代世界」(China and the Modern World)則改爲「中國在當代世界」(China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始於1900年而不設教授時代的下限。這個重新整理既保留了原有的課程設計特色，又反映了中國在世界歷史發展中扮演的不同角色，也可見中國與列國從不同的文化交往中，演進成爲世界歷史進程中不可缺少的一員。當中主要探索的是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係，藉此揭示中國在古代、近代和當代世界構成中扮演的角色及貢獻。

從科目的時限設計上，可以看見這個「群組」是參考了「世界歷史」的課程設計系列。這個課程設計的目的，是與世界歷史的課程互相對應及「配對」(pairing up)。學生選擇修讀這些「中國與世界」系列內的科目，宜先修畢相關的世界歷史科目。這個建議是先讓學生掌握世界的宏觀發展，然後當選讀「中國與世界」的系列時，同學可以把注意力集中於發現及了解中國在過去所錯失的機會，這樣說明了爲甚麼當西方國家致力發展近代化時，中國縱有雄厚的實力卻沒有好好發揮。最顯而易見的例子是海權的發展，明代七下西洋的鄭和比西方航海家早約六十年成功橫渡印度洋到非洲，其船隊規模遠比西方優勝，可惜明代的中國，沒有因鄭和航海的成就而成爲強國。相反，較遲起步的西方卻因爲探索新航路繼而發展海權，並成爲近代世界的主宰，而中國則成爲西方的侵略對象。此外，這個「中國與世界」的「群組」也補充了學生從「中國歷史」課程的核心系列學到的知識，旨在強化同學們的「中國情懷」。總之，這個「中國與世界」的「群組」有著「接橋」的功能(bridging function)，把兩個獨立又「平衡」(run in parallel)的中國及世界系列的課程聯繫起來，爲學生提供一個既深入又獨特的「中國與世界的視野」(China vis-à-vis world perspective)。

爲了加深學生了解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關係，本系在這個系列課程內新增了第一個以專題形式的選修科目——「中美關係」(Sino-American Relations)，這反映出中美兩個國家是現今世界舞台上兩大重要的伙伴或對手的事實。若是未來的資源容許及有需要下，將加入相同的專題形式的選修科，以強化「中國情懷」與「世界視野」的元素，並拓展「中國與世界」系列的「接橋」功能。

(3) 深入「中國」，遠披「世界」的「區域史」

設計「區域史」系列課程意在開拓學生的視野，提高同學們了解中國四周的環境和培育同學們的歷史觸覺，尤以中國邊疆及「特區」爲主，透過講授具有特殊歷史、政治、經濟背景和發展的地區，以訓練同學們多方面的思維模式。這個「群組」按中國爲本位，分成「區域史 A：中國地區」和「區域史 B：非中國的國家及地區」。前者包括與中國息息相關的中國人地區及中國國家事務的議題，例如香港。後者選擇了一些對中國發展甚爲重要，或其歷史發展值得中國借鏡的國家或地區，包括美國及近代日本。這個多元的設計除了增加學生對不同地區的興趣外，亦加深同學們對中國的認識和培養「中國情懷」，又可開拓學生的「世界視野」，藉以發展他們多角度及批判性的思維方式。

「區域史」的發展充分反映出整個課程的「有機」性質和與時俱進的要求。「區域史 A」是從原有設計的「香港史」系列發展出來。後者包括了三個必修科目，分別是「香港史」(History of Hong Kong)、「1949 年後的香港經濟史」(Economic History of Hong Kong Since 1949) 和「香港與珠三角：1978 年以後的社經變遷」(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 Since 1978)，讓同學們更深入了解自己身處環境及畢業後所面對的社會。關於這個系列的變動有兩點：一、由於香港已回歸中國，加上香港日漸與中國內陸緊密的聯繫，不適宜把「香港史」系列作獨立的「群組」，故整個系列被納入新編的「區域史 A」；二、有見香港歷史的重要性，亦新增了一個選修科目：「回歸後的香港：問題、挑戰與機遇」(From Colony to SAR: Reunificatio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in Contemporary Hong Kong)。除了銜接以 1842 年至 1997 年爲時限的「香港史」科目外，這個新增的科目也爲了裝備學生。如其他系列的當代史一樣，「回歸後的香港」也不設立教導時期範圍的下限，讓學生能保持對時事的觸覺及與時俱進的學習態度，使他們在踏進社會時，能夠擁有競爭力並好好把握機遇。值得注意的是，「區域史 A」的「群組」並不是單純從中國人的視野角度作探討，以「香港史」爲例，由於也涉及國際因素，亦須揉合國際視野在內。以上例子說明了「世界視野」是繼「中國情懷」之後，本系設計課程的另一個重要考慮的元素。

「區域史 B」系列所包括的科目均是選修科目，目的是發掘學生對非中國國家或地區的興趣，建立同學們的「世界視野」。基於資源的考慮，現行開辦了三個較爲「實用」的科目，分別是「當代中東的構成」(Making of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美國史：主要議題」(History of USA: Key Issues)、「近代日本的構成」(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它們的「實用」性大致有三方面：一、近年中國與這些地區的關係日漸緊密，甚至牽涉及國際議題上，例如近年的中美外交角力也伸延至中東地區；二、一些科目如「美國史」及「近代日本」作爲本課程補充之用，加深及支援學生從其他系列所學到的知識，尤其是「中國與世界」；三、鞏固學生對時事的觸覺、鼓勵多角度思考及開拓「世界視野」，例如「當代中東」與「美國史」是沒有設教導範圍時段的下限；「近代日本」的課程設計，以日本爲中國近代化過程提供一個比較及學習典範，協助同學們深入了解中國近代化發展所遇到的困難及機遇。

(三) 總結：課程改革及其展望

本系各教員深信為新一代中國大學生設計的歷史課程，應以中國為本位，中國歷史為整個課程的核心，內容始於中華文明的起源至今日的中國，銳意培養學生的「中國情懷」。隨著改革開放的成就，中國的崛起使中國國力成為當今世界舞台上的焦點，也是國際體系中不可缺少的成員。故歷史系課程設計的另一個重要元素就是開拓學生的「世界視野」，一方面讓學生能夠深入了解中國如何從一個被孤立於世界體系的弱國，演變成為今天被西方世界「既羨慕又妒忌」的大國；⁵ 另一方面，可以裝備學生，鞏固踏足社會的競爭力，並能藉歷史知識以掌握時代發展的新機遇。

本系課程設計的重要抱負就是培育新一代大學生為未來領袖，因為將來的發展是要依靠年青一代。從這裏衍生了「全人教育」(all-rounded person) 的概念及把整個課程革新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的發展方向。當中的關鍵是前文談及「群組」之間的「接橋」特色及互動的緊扣關係、課程內容的「實用」，是否與時俱進和「靈活處理問題的技巧」，即是說明學生接觸的範疇及技巧必須多元，並且能夠應付任何挑戰和把握新的機遇。經過五年的努力，這個「有機的整體」的雛型已大致勾劃出來，並成為本系未來規劃課程的指引。

由於這次改革仍處於探索階段，所以這五年來遭遇了不少困難，亦有不少改善和拓展的空間。我們面對的困難主要來自資源及工作量兩方面。首先，為數不少的當代史課程均沒有設立教導範圍時段的下限，故每當這些課程要開辦時，便需要每次更新資料及教材。其次，部分課程如「當代中東」和「回歸後的香港」是香港歷史學界仍在發展中的新範疇，所以相當缺乏有質素的教材及參考書籍，故本系教員也花上很多時間及精神編製教學資料。最後，因需要培養學生的「靈活處理問題的技巧」，讓同學們更具競爭力，在設計課堂活動及功課時得多花一點心思，務求使學生能涉獵多種技能，如電腦科技知識等。

至於本系課程的改善方面，未來的計劃有兩點：一、在各個「群組」內增辦多些課程，既使課程更完備，又可以強化「中國情懷」及「世界視野」的元素，並緊貼及回應當代中國的發展和迅速萬變的世界。現在計劃中的新課程包括在「中國歷史」系列內開辦「傳統中國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a) 以連接已開辦的「近代中國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 of Modern China)；與及在「區域史 A」系列內增設「西藏：歷史、議題及爭論」(Tibet: History, Issues & Controversies)、「當代台灣」(Contemporary Taiwan)、「新疆研究」(Xinjiang) 及「中國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s)。二、不斷更新及改善歷史系內的「教學與資源支援中心」(Teaching and Resources Support Centre) 的資料庫。由於課程各個「群組」是互相聯繫的，所以一個完善的「資料銀行」(data bank) 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但可以更有效地運用資源，也可以提升授課及學習的質素，且會大大減輕各教員的工作量。

綜合而言，「崛起中的中國」(The Rising China) 是不爭的事實，故課程改革是刻不容緩，目的是要好好裝備我們的下一代，使他們能夠「看透歷史」，並且能夠依時代演變，更準確地「掌握明日機遇」，成為世界領袖！⁶

5 同上。

6 同上。

❖ 書 評 ❖

周佳榮著《新民與復興
——近代中國思想論》（第二版）

書 名：《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第二版）

著 者：周佳榮

出 版 地：香港

出 版 社：香港教育圖書公司

出版年份：2008

頁 數：335

在《歷史與思想》一書的自序中，余英時教授強調思想在歷史進程中的積極作用；¹ 而思想的演變則受思想內在的特質、規律以及外部社會、政治、文化等因素所影響。其中思想發展和各時代政治社會狀況形成互動關係，英國哲學家羅素在其《西方哲學史》指出，「哲學家同時是『果』也是『因』。他是『果』，因為他的思想離不開他所處的社會環境，以及政治與制度的背景；他是『因』，因為，如果幸運的話，他的思想變成一般人的信仰，便可以塑造後來的政治與制度。」² 伴隨當代史學研究在資料、方法、視野等領域的擴展，對思想發展內在和外緣因素的不斷研究有助補充、修正和推翻傳統論述，以至創造全新的觀點和理論。這不但描繪出思想史新的面貌，³ 也可深化對其他專門史的理解。⁴

周佳榮教授的《新民與復興——近代中國思想論》正透過亞洲史和報刊視野重新考察晚清以來中國的重要思想。本書結集的十五篇論文、三篇附錄以及其章節編排反映作者在不同時期的研究興趣。在第一部分「亞洲聯繫的開展」，先以梁啟超、章太炎、孫中山等人與亞洲的關係作總領，分析他們的思想如何受亞洲國家，尤其是日本的影響。作者於第二及第三部分再條分縷述維新與革命的重要思想。「維新和啓蒙思潮」裏的論文集集中利用梁啟超發表在《時

1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1976年），自序4。

2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自序6；韋政通：〈中國思想史方法論的檢討（代序）〉，載於韋政通編著：《中國思想史方法論文選集》（台北：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6年），頁13-14。

3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課堂講錄：視野、角度與方法》（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頁1-20。

4 鄭大華、鄒小站主編：《思想家與近代中國思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前言1。

務報》、《清議報》和《新民叢報》的文章析論梁氏的新民思想；至於在「政治變革與復興」中作者的「亞洲情意結」再次強烈展現：談及的無論是章太炎、孫中山、蔡元培的思想抑或辛亥革命的影響，都指涉其與亞洲國家的關係。亞洲史的視野無疑加深讀者對近代中國思想的理解。以往對該思想外緣因素的解讀，多著重中國內部政治局勢及西方文化傳播的影響，似未特別關注中國近代思想發展與亞洲國家的互動關係。就以梁啟超的研究為例，雖然梁在戊戌維新後流亡日本並創辦《新民叢報》，但學界似乎忽略日本明治文化對梁氏思想的影響；此學術空白在本書〈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思潮〉一文獲得填補。作者細論日本學者德富蘇峯及明六社思想家對梁氏思想的影響，有力證明「梁在接觸西方思想學說和作出取捨的過程中，明治思想家直接間接產生了誘導和左右的作用」（頁 78-79）。再如〈章太炎論印度民族獨立運動〉不但揭露該國學大師鮮為人知的面貌，也深化對章氏國粹主義革命思想的認識。以至於對待「辛亥革命的影響」這類已有大量論述的傳統課題，作者也能翻陳出新，透過重讀中國與亞洲國家的交往，發掘出革命共和思想對朝鮮、越南、印尼等國的衝擊。而除了亞洲史視野，報刊作為理念知識的重要載體和傳播工具成為作者探究近代思想的另一角度。甲午戰爭以後的維新運動時期，因為由士紳階級的知識分子主辦以及極富政治和社會意識，報紙成為一種新型的傳播媒介。它和學校、學會令維新時代新思想在中國內陸城市逐漸散佈。⁵ 本書〈從思想史看《新民叢報》〉一文論及《新民叢報》與啟蒙思潮、反傳統思想及社會主義傳入中國的關係，從而說明「《新民叢報》的興衰，足為近代中國史上時代思潮趨演的一個重要代表。」（頁 181）事實上本書另一篇文章〈「蘇報案」論爭始末述評〉正反映報刊的發展是近代中國重要的文化現象，有時更影響政治的變遷。

徵而有信、信而有據的敘述體現本書的學術性。除了前述以原始報章資料歸納梁啟超的新民思想，作者又以魯迅的日記為基本線索，精細考察出魯迅與蔡元培「既不十分親密，也絕不疏遠」（頁 296）的關係。而對於「東亞亡國同盟會疑即亞洲和親會」的說法，作者亦參考和親會約章的記載來提出合理質疑。至於精彩的評論也為各篇文章添色不少。它不但是作者對相關課題的有感而發，而且把本已遠去的近代思想聯繫當代社會，以歷史經驗啟迪新民和復興的道路。正如作者詳細介紹梁啟超如何受明治思想家影響後不忘提醒：「如果把二十世紀初年梁啟超的言論思想，視作日本明治思潮的縮影，則其面貌顯然是欠缺立體感的。」（頁 80）此客觀品評強調了思想發展的複雜過程以及對梁啟超後續研究的必要性。正如韋政通所指，「十九世紀中葉以後，中國的思想與世界潮流息息相關，尤其在新文化運動以後，中國簡直是世界思潮的戰場，每一個思想人物的思想來源不但複雜，而且多變，要追究其思想淵源和發展之道，皆牽涉甚廣」。⁶ 或許學者難以絕對完整客觀地還原梁氏思想的來龍去脈，但本書和其它研究無疑使其面貌越來越清晰。而藉著重讀原始史料，作者亦令人信服地批駁一些對梁啟超不公允的批評：「以為《新民說》只責備人民而不責備政府，把國家的衰弱歸因於人民而替統治者開脫罪責之類的說法，實在是斷章取義的片面觀感。」（頁 146）作者不但重申梁啟超及其學說的現代意義，也讓人警醒文化弊端的潛藏與危害：「諱言本身民族的缺點，不願接受善意的批評，沉迷於民族自誇的豪言狀語之中，甚至恃意氣而逞一時之快，不也正是

5 張灝：〈晚清思想發展試論〉，載於張灝等著：《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晚清思想》（台北：時報文化，1980年），頁 28-29。

6 韋政通：〈中國思想史方法論的檢討（代序）〉，頁 15。

《新民說》所指出，而要加以洗滌的麼？」（頁 147）如此真情流露的文化批判和反思或者正呼應作者在自序所言，「在亞洲政壇上，相信只有這一類型的人物（文化意識型的政治家），可以真正地為眾多苦難的人們引領前路。」（序 iii）

當然，本書白璧之中尚存微瑕。其中第一部分輯錄的〈梁任公與《越南亡國史》〉固然考據精密，令人敬佩；但該文主要是釐清《越南亡國史》的作者誰屬問題，對梁啟超思想與越南的關係或可再多作說明；至於〈晚清時期的「日系報刊」〉如能進一步著墨於日系報刊與近代中國思想的互動影響，則似乎可更強化本書主題的整體一致性。另外，〈戊戌維新時期思想家的日本認識〉一文指梁啟超寫〈記東俠〉時是否曾看過康同薇的《日本變法由游俠義憤考》「實不得而知」（頁 47）；但在〈梁啟超與日本明治思潮〉再次提及有關歷史時，作者卻「相信梁啟超寫〈記東俠〉時是看過該書的文稿」（頁 63）。不知作者何以對該問題有不同看法？

作者在書中評價辛亥革命意義時強調：「任何重大的事件，都只是歷史發展的一個環節，有其獨特的意義，也自然有其局限性，只要起了它的時代作用，便不失為一個足資紀念的歷史事件。」（頁 242）而筆者認為本書所述內容於當代社會仍深具意義。借古知今是閱讀史著的重要價值，對「古」的新發現因而不斷調整對「今」的認識。本書闡述的近代中國思想尤其是當中反映的中國與亞洲關係，正有助對原有歷史敘述的補充、修正以及反思，從而使讀者得以有根有據地理解當今世界，而不至於人云亦云，此亦是「新民」所應具備的涵養矣。

黃耀忠（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 書 評 ❖

林學忠著《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
晚清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

書 名：《從萬國公法到公法外交：晚清國際法的傳入、詮釋與應用》

著 者：林學忠

出 版 地：上海

出 版 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9

頁 數：444

晚清時期的中國面臨被列強瓜分的危機，被迫簽訂各種不平等條約，在不明白自身權利的情況下，對中國尤為不利。國際法的傳入不但令中國得以認識國際法律和外交規則，更令中國知道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定位。作者在〈緒論〉中指出：「本書的目的，在於從傳入、詮釋及應用的角度重構晚清接受西方國際法的史實，探討中國如何從傳統王朝帝國走向現代意義的主權國家，如何從“中國之天下”走向“世界之中國”的歷史進程，並為研究晚清以來中國近代史的變動過程提供一個有效的切入點。」（頁 37-38）這就是本書的寫作目的。

第一章〈世界秩序的中國文本：晚清國際法的傳入〉探討了國際法在晚清時期傳入中國的經過。中國首次接觸國際法，始於 1689 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的簽訂。康熙雖然同意根據近代西方國際法的國家主權平等原則與俄國締結《尼布楚條約》，卻沒有打算此後以西方國際法作為對外交涉的依據，加上雍正和乾隆以後的閉關政策，妨礙了西方國際法傳入中國。美國長老會傳教士丁韋良翻譯了惠頓的名著《國際法原理》，取名《萬國公法》，於 1865 年在北京刊行。1896 年以後，愈來愈多中國學生到日本留學，其中修讀法律和政治的學生大量編譯法政叢書。總括而言，西方國際法的傳入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只翻譯國際法的部份章節以應付特定的外交事件，第二階段由傳教士翻譯整部國際法，最後由留日法政學生編譯日本國際法。

第二章〈晚清國際法教育〉勾勒了晚清國際法教育的基本實施情況。中國的近代西方國際法教育始於 1862 年成立的同文館，旨在培養翻譯人才。其後，上海廣方言館、廣東水陸師學堂、天津中西學堂和上海中西書院先後成立。義和團事件後，滿清政府實行新政改革，其中教育改革將各省仕學館和課吏館改為法政學堂，興辦法政教育，成為中國近代國際法學和政治學的教育中心。近代中國的留學運動始自自費留學，其後滿清政府開始派遣官費留學生到美國留學。自強運動時期，福州船政學堂派遣學生到英國、法國和德國等歐洲國家留學。甲午戰敗後，同文館派遣學生到英國、法國、德國和俄國留學，學習外語、外交和法律。新

政時期，清政府派遣留學生前往留學的國家除了英美俄法外，還有比利時和日本，其中日本更專為中國留學生開辦法政速成科。

第三章〈晚清國際法規〉探討了中國如何從西方國際法去認識新的世界秩序。中國自古以來以天下第一大國自居，蔑視所有其他國家，直至清中葉以後列強叩關，有識之士始明白到中國只是世界其中一員，而且並不在強國之列。世界各國的關係理應是平等的，但實際上，一國的地位是取決於其國力的強弱。面對列強的瓜分，曾出使英法的郭嵩燾認為中國應重新審視自己在國際政治外交舞台中的位置，扔棄以往的華夷觀念和自大自戀。事實上，中國口中的蠻夷番邦甚至比中國擁有更久遠的歷史，非洲、美洲和歐洲是世界文明的發源地，中國才是真正的蠻夷。雖然不少迂腐的保守派官僚仍然不肯接受現實，但洋務官僚已經認識到西方的文明。歐美各國之間勢力均等，自然享有同等的地位，完全適用國際法。但中國比列強弱，自然不能享有和列強同等的地位，亦不完全適用國際法。所以，擺脫野蠻，走向文明，加入國際社會，爭取和歐美各國平等的國際地位就成為了中國的目標。

第四章〈國際法的應用與挫折〉以中國和朝鮮之間宗藩關係的變化說明國際法應用於中華世界秩序中的問題。「條約體制」和「朝貢體制」在晚清時期並存，日本及列強介入中國及朝鮮之間，不但形成複雜的外交問題，更導致中國和朝鮮之間的宗藩關係發生變化。儘管中國仍然與朝鮮保留宗藩關係，但傳統的中華世界秩序原理已經無法維持中朝關係，中國被迫訴諸國際法去維持與朝鮮之間的關係，在勸朝鮮對外開國的同時，引用國際法的宗主國原則證明其對朝鮮的宗主權。朝鮮開國後，中國重新檢討和朝鮮之間的關係，而朝鮮人民亦形成新的世界秩序觀，因為傳統的「事大交鄰」體制已無法適用於新的國際秩序，1887年朝鮮遣使赴美更說明了中國和朝鮮在應用國際法問題上的矛盾。根據國際法，朝鮮以主權國的身份遣使駐外，等同於獨立國家，和別國擁有同等的地位，即是和中國平等，但當時中國和朝鮮之間仍然保持宗藩關係，可見國際法於中華世界秩序中的應用導致了複雜的外交問題。

第五章〈“文明”與和平：晚清政府參加萬國保和會〉透過晚清政府在萬國保和會中的參與去理解近代中國進入世界秩序的過程。古十九世紀以後，世界各國之間的接觸愈來愈頻繁，同時亦帶來愈來愈多的紛爭和戰爭。1814年，歐洲列強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舉行國際會議，開啓了歐洲協調時代。在1899年第一次海牙會議和1907年海牙會議中，中國的參與意義重大，因為加入國際組織是爭取國家獨立自主的第一步，而且令中國明白到進行政法改革的迫切。中國必須整備國內法律，培養外交人才，才能適應新的國際秩序，進入文明國家之列。兩次海牙會議的參與不但令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所提高，令中國得以認識國際會議的運作，更重要的是促使清政府進行立憲。值得注意的是，在兩次海牙會議之中，歐美各國並未將中國視為同等，而中國亦未能擺脫大國意結，在追求的和歐美列強平等的同時，並不接受自己與其他亞洲、中南美洲和非洲的小國平等。可見在現實之中，各國平等是沒有可能實現的，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始終由其國力所決定。

第六章〈構建近代國家：文明的追求〉探討中國怎樣爭取成為受國際法保護的國家。西方列強認為國際法只適用於文明國家，因此中國以成為文明國家為目標，不僅在新政期間進行立憲，還對法律、軍事、財政、教育及其他舊有體制作出改革。清政府推行的新政改革提高了國民的教育水平，令人民開始產生主權和民權意識，地方自治權又得以擴大，削弱了清政府的統治，促成了革命運動的展開。不過，立憲派和革命派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就是成為文明國家，續而廢除不平等條約，然後取得與歐美列強同等的國際地位。值得肯定的是滿

清政府進行的法制改革，一個國家文明與否，其法律制度為決定因素。中國歷來先假定犯人有罪，嚴刑迫供和屈打成招之事常有，歐美則假定疑犯清白，並設有陪審團，非法官一人獨斷，這就是中國與歐美列強司法制度的根本分別。新政期間，法制改革逐步實行，清政府更在 1902 年得到列強承諾，以中國實行法制改革為條件，廢除領事裁判權，向構建近代國家邁進一大步。

最後，作者在〈結論〉中特別指出，許多有關國際法在晚清時期傳入中國的研究，都將中國接受國際法的時期設定在十九世紀中至末期，但作者以國際法相關譯著的出現、國際法意識的產生及國際法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實踐為依據，認為國際法要到二十世紀初才融入中國人的共同認知範疇之內，中國人到那時候才普遍視國際法為衡量國家文明的尺度。直至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以前，《萬國公法》還未對中國的思想界產生重大影響，而且自《萬國公法》刊行以後，清政府並沒有對其他西方國際法著作進行翻譯。直至《萬國公法》刊行十多年後，《公法便覽》才面世。中日甲午戰爭後，國際法開始在中國普及，除了官僚和知識份子外，普遍人民亦認識到國際法的重要。此後，中國應用國際法進行「修約外交」，逐步廢除不平等條約，向建立主權國家，躋身文明國之列的目標邁進。

廖懷恩（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 書 評 ❖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編《買辦與近代中國》

書 名：《買辦與近代中國》

編 者：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系

出版地：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社：香港

出版年份：2009

頁 數：298

最近香港社會出現一股仇商、仇富的情緒，本港富商被批評只顧賺錢，對社會關懷不足。閱讀《買辦與近代中國》一書，也許有助我們反思仇富或仇商這種社會現象。在評介本書內容前，首先解釋買辦的意思。陳旭麓、方詩銘、魏建猷主編的《中國近代史詞典》對此作出定義：

買辦也叫「康白度」（葡萄牙文 Comprador 的音譯），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中替外國資本家在本國市場上服務的中間人和經理人，原指歐洲人在印度雇有的本地管家。在我國，買辦一詞，明代指供應宮廷用品的商人。在清代公行貿易時期，為居住於廣東商館的外商服務的中國採買人或管事人的名稱；……鴉片戰爭後，公行制度取消。買辦便成為外商自由雇用的雇員。隨著洋行業務的開展，他們參預業務經營。……他們成為洋商和華商之間不可缺乏的中介人和代理人。……洋行也允許買辦自營商業，買辦具有洋行的雇員和獨立商人的雙重身份。……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買辦改稱華經理。

由此可見，探討近代中國經濟現代化、中國對外關係，買辦這個群體是不可不注意的。至於本書的出版源起，就是本書編者之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在 2008 至 2009 年舉辦展覽會，展覽香山買辦莫仕揚家族收藏的文物。為了宣傳展覽會，並且推動近代中國買辦的研究，該文物館與同校的歷史學系於 2009 年 3 月，合辦了「買辦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本書收錄該研討會上發表的文章，在書首〈序言〉中，編者說明出版目的，就是「祈為推動及深化買辦與近代中國之研究，有所增益。」

本書共有十篇論文，其中有兩篇論文以買辦群體為探討對象。馬學強〈上海買辦的生活〉一文闡明買辦的性質、起源及其成員來源的變化，論析他們在會館公所、工商企業，還有洋務運動中的地位，並且通過商人、學者、文學家，以至政治人物對買辦的看法，展示買辦在中國人眼中具有多種的形象。該文亦探討上海買辦的衣食住行、生活開支、娛樂嗜好、生活

習慣與風尚，具體地顯示他們獨特的生活方式，並分析出現這種方式的原因。張曉輝〈買辦的企業家精神——兼論買辦的歷史作用〉首先闡釋買辦的企業家精神特徵，就是勇於創新、冒險與開拓，並且具有民族意識。此外，也討論買辦的經營方式，主要有四種，分別是附股式、家族制、聯營制和多元化經營。最後，論述買辦對近代中國政治、社會、經濟不同方面的貢獻。政治方面，支持維新與革命運動；社會方面，促進通商口岸和香港的都市化；經濟方面，推動近代中國工業化，扶助商會成長，還有發動抵制外貨、提倡國貨運動。

除買辦群體外，買辦家族也是本書的探討對象。鄭宏泰、黃紹倫〈何東買辦家族的政商網絡〉一文，旨在「利用何東買辦家族的個案，深入而具體地闡述一個規模龐大的買辦家族，如何在香港開埠初期那個相對匱乏的環境下迅速崛起，之後又如何利用婚姻結合或同窗好友等關係網絡壯大實力，然後再將其商業觸角延伸至政治層面，提升家族的綜合影響力。至於奔走華洋過程所產生的正面或負面效應，亦會一併討論。」（頁 127）丁新豹〈香港莫仕揚買辦家族初探〉根據收藏於香港政府檔案處的報刊、政府憲報、囑書，以及土地買賣記錄等材料，論述莫仕揚、莫藻泉、莫幹生祖孫三代的生平、商業與社會活動，尤其是他們三人與太古洋行的關係。太古洋行於 1867 年在上海成立，1870 年在香港設立總部。莫仕揚只是從旁協助太古洋行，莫藻泉與莫幹生則長期擔任該洋行的香港總行買辦一職，直到 1920 年代後期，莫氏家族才與洋行脫離關係。至於探討莫仕揚這個買辦家族的意義，就是「恰恰見證了從行商到買辦的過渡、買辦階級的崛起、黃金時代及沒落。」（頁 184）

廣東香山（現在的中山市）是近代中國買辦之鄉，唐廷樞、徐潤、鄭觀應三人是香山買辦的代表人物，他們當然受到本書部分作者的注意。胡波〈買辦與社會轉型——以香山買辦為中心〉以香山買辦上述三人為例，說明買辦的出現原因與性質，還有他們在經濟與文化上的表現和作用。買辦的歷史作用方面，作者表示「買辦在近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轉型過程中起了其他階層所不會有的積極作用。以香山買辦為代表的近代中國買辦群體，……成為東西方的中介人、近代中國工商業興起的關鍵人物、社會風氣的開新者。」（頁 120）唐廷樞與徐潤二人加入在 1873 年由李鴻章興辦的輪船招商局。輪船招商局在二人主持期間，其發展踏入黃金時期，一度成為東亞航運業的翹楚。易惠莉〈唐廷樞、徐潤與招商局之籌建與改組〉探討唐、徐二人經營輪船招商局的這段歷史。該文交代了唐廷樞、徐潤加入招商局的經過與波折，並且評價二人的表現和影響，認為「在唐廷樞和徐潤的主持下，招商局經營規模之擴張進行得有聲有色，且有條不紊，……而招商局主持人的身份則全面提升了唐廷樞、徐潤在社會及政府方面的地位。」（頁 210）

卜永堅〈徐潤與晚清經濟〉概述徐潤的生平及其重要經歷，評介關於徐潤的主要史料與中外學者如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郝延平、全漢昇、劉廣京、黎志剛等對徐潤研究的重要成果。與此同時，作者說明 1883 年上海的金融危機對徐潤影響，一方面使徐氏接近破產，另一方面徐氏還清對上海二十二家錢莊的欠款，挽救了上海金融界，贏取當地商界的尊重與景仰，為他日後進行商業活動，奠定良好的基礎。陳麗蓮〈買辦生涯對鄭觀應的影響〉指出鄭氏在 1858 至 1882 年間，任職上海寶順洋行、太古洋行輪船公司，開展其買辦生涯，而這段生涯對他「社會地位的提高、事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視野的擴展、思想上的飛躍，產生了重要的作用。」（頁 237）該文以鄭觀應《救時揭要》的文章，還有他救濟災民、管理輪船招商局為例，作出具體闡析。兼且介紹同樣任職買辦的鄭觀應親屬。

本書的最後兩篇文章，側重探討民國時期買辦的經濟、文化活動。蔣寶麟〈從買辦到華

商——劉鴻生煤炭經銷策略探析（1910-1930 年代）》論述劉鴻生任職上海開平礦務局買辦期間的煤炭經銷策略，還有他的碼頭堆棧、開採煤礦等生意。這些業務對劉氏本人，及其與開平礦務局關係構成很大的影響。個人方面，「由於買辦的身份和業務，為劉鴻生提供了最初的原始資金積累，並構建了未來企業體系的人脈網絡。」（頁 270）劉氏與開平礦務局關係方面，他從買辦變為公司合作者。作者亦以劉鴻生為例，比較買辦在十九、二十世紀兩個時期的性質。梁元生〈文化買辦、邊際人、之間人——鄭富灼與伍聯德〉首先對文化買辦作出釋義，就是「只要是跨越兩種語言、兩個文化之間的工作者，都可以冠予文化買辦的頭銜。」（頁 278）鄭富灼、伍聯德均接受西式教育，前者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從事翻譯工作，後者創辦《良友》畫報，傳播中西方知識，因此作者強調鄭、伍二人都是名副其實的文化買辦。除文化買辦外，他們也是「之間人」，即是「生活於兩個世界及多個文化之間的人物。」（頁 292）作者深信不論是文化買辦或之間人，均是社會上難能可貴的人材。

近代中國買辦的研究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左右，沙為楷《中國買辦制》、甘作霖〈論洋行買辦制度之利害〉、馬寅初〈中國買辦制〉、瞿秋白〈上海買辦階級的權威與僑民〉是這方面研究的最早期作品。繼後外國學者也開展買辦研究，中外學者的買辦研究重要著作，專書方面，計有聶寶璋《中國買辦資產階級的發生》、黃逸峰《舊中國的買辦階級》、汪敬虞《唐廷樞研究》、夏東元《鄭觀應傳》、郝延平著，李榮昌等譯《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論文方面，則有劉廣京〈唐廷樞的買辦時代〉、根岸佶〈買辦制度的研究〉、本野英一〈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上海買辦登記制度的失敗和出口制度的變化〉等。這些著作主要探討買辦的性質、產生原因、收入來源、政治傾向，還有買辦與洋務運動及中國工業化的關係，兼且對買辦的歷史作用作出評價。¹《買辦與近代中國》一書的論文，部分對買辦的性質及其歷史作用、個別買辦如唐廷樞與鄭觀應進行研究，延續過去學者的研究方向，並且進一步深化。與此同時，有些論文對香港買辦如何東家族、莫仕揚家族展開探討，這些買辦家族在從前較少受到中外學者注意，因此使買辦研究添上新意。由此可見，《買辦與近代中國》這本書在買辦研究歷史上，顯示出承先啓後的特色。

郝延平在《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中曾經表示「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買辦是名副其實的東西方之間的中介人，因為他們的活動遠遠擴展到中國之外，而達到亞洲的其他地區。到 1870 年代，中國的買辦人物在日本、朝鮮、印度支那、曼谷、仰光、檳榔嶼、馬六甲、新加坡、爪哇和馬尼拉等地活動，他們的影響甚至及於印度。」閱讀《買辦與近代中國》內的文章，發現它們集中剖析買辦對近代中國發展的貢獻，未有留意他們在國外的影響。若論文作者日後繼續開展買辦研究，可以嘗試探討買辦與東亞、東南亞地區近代化的關係，使讀者對買辦的歷史貢獻有更加深刻的認識。最後，「郭廷姁」（頁 165）、「林郁生」（頁 291）中的「姁」、「郁」兩字，應該是「以」、「毓」。

文兆堅（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1 張萍：〈近代買辦研究綜述〉，《清史研究》，第 1 期（1996 年），頁 111-118。

❖ 學界動態 ❖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活動匯報（2010年下半年）

■ 公開講座

2010年11月12日舉行的公開講座，邀請台灣交通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系講座教授李弘祺教授主講「最近英文世界對中國及比較史學的研究」。

■ 研究生講論會

日期	博士研究生	講題
2010年10月21日	黃嘉康	清季福建名人研究述評
2010年11月18日	黃彩蓮	華南基督教區域史研究述評

■ **Historians Say: Lectures by Our New Faculty Members**

Date: 2 December 2010

- Dr. Bettina Dietz, “Making Knowledge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 Dr. Loretta Kim, “Tribute and Territory: Qing Frontier Administration and Tungusic Peoples of Heilongjiang”;
- Prof. Jacqueline Moore, “Cowboy Masculinity, the American Frontier, and the Myth of Exceptionalism”.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學界動態 ❖

「性別視野中的中國歷史新貌」交流會與展覽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主辦的「性別視野中的中國歷史新貌」研究與教學經驗交流會於 2010 年 12 月 14 日舉行，講者包括：方秀潔（麥基爾大學東亞學系教授）；呂妙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李貞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李滢（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杜芳琴（天津師範大學性別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林麗月（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金由美（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陳玉女（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葉山（Robin D. S. Yates，麥基爾大學東亞學系 James McGill 教授）；葉漢明（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劉詠聰（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鄧小南（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盧嘉琪（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導師）。

評論員包括：文潔華（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吳存存（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李木蘭（Louise Edwards，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課程主任、教授）；林學忠（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高級導師）；范家偉（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助理教授）；馬健雄（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助理教授）；華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楊彬彬（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助理教授）；楊靜剛（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趙雨樂（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劉光臨（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助理教授）；戴仁柱（Richard L. Davis，嶺南大學歷史系系主任、講座教授）。

組別主持依次為：李貞德；杜芳琴；張宏生（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教授）；梁其姿（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熊秉真（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鄧小南。交流會有兩位嘉賓，一位是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及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李伯重教授，另一位是香港大學文學院院長雷金慶教授。

交流會的觀察員計有：上海師範大學人文及傳播學院歷史系祝雨微、陳佳寒，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蕭琪，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張贊及歷史系曾昭朗，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章霽琳、黃震宇、葉嘉茵，分別是上述院校的博士、碩士生。至於香港浸會大學擔任工作委員會的研究生有鄭愛敏、黃耀忠、陳家怡、黃宇軒、吳綺靜、丁潔等。

同日下午並舉辦「語錄及書籍展覽」開幕禮，由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陳新滋教授、社會科學院署理院長蘇秀冠教授、歷史系系主任麥勁生教授、署理圖書館長陳啓仙女士、好書會代表盧偉力教授、杜芳琴教授、林麗月教授、葉山教授、劉詠聰教授主持剪綵。展覽由香港浸會大學區樹洪紀念圖書館及好書會協辦，展期至 2011 年 2 月 10 日。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學界動態 ❖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 活動匯報（2010年）

■ 近代中國基督教史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主辦的「近代中國基督教史講座」，在2010年春季有兩次活動：

第31講：邢福增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主講「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知識份子」；

第32講：夏其龍神父（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主任/天主教檔案處主任）主講「近四十年來香港天主教的發展」。

上述活動在該校溫仁才大樓 OEE902 室舉行。

■ 香港報刊史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於2010年4月21日在該校邵逸夫大樓9樓會議廳舉辦「香港報刊史講座」，內容包括：

1. 丁潔小姐（浸大歷史系博士候選人）主講「《華僑日報》創辦和刊行經過（1925–1995年）」；

2. 周佳榮教授（浸大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講「香港報刊與全球華文報業發展（1990–2010年）」。

■ 中國基督教史演講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於2010年4月24日與中國基督教史學會合辦學術演講，包括兩個講題：

1. 彭淑敏博士（浸大歷史學系）主講「師資與財務：民國時期福建協和大學之研究（1916–1949）」；

2. 林雪碧博士（聖神修院神哲學院）主講「學官型天主教徒：吳經熊（1899–1986）生平與學術思想之研究」。

上述活動在該校鄭翼之講堂舉行。

■ 孫中山思想研討會

由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香港中山學會及中華港澳之友協會主辦的「中山思想現代化對當前兩岸四地政經關係的影響」研討會，2010年5月8日在香港浸會大學逸夫行政樓五樓會議廳舉行。宣讀論文計有：陳蘊茜（南京大學）「孫中山符號在台灣傳播與意義轉化」、邵宗海（中國文化大學）「中山先生與民族主義思想」、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網絡與亞洲視角——孫中山思想的當代意義」、曹俊漢（中國文化大學）「全球化下中山思想發展與新思維：對國家角色的詮釋」、李金強（香港浸會大學）「兩岸關係發展及中山思想的啓迪」、龐建國（中國文化大學）「中山思想與中國模式」。同日下午舉行圓桌論壇，主題是「兩岸關係新格局下香港中介角色的挑戰與前瞻」。

■ 香港史學名家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與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於2010年6月18日合辦「香港史學名家講座」，邀請兩位主講嘉賓：林啓彥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講「與史有緣」，張偉國教授（香港公開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院）講「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與我」。講座在香港浸會大學逸夫行政樓（SWT501室）舉行。

■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專題講座

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於2010年10月11日舉辦「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專題講座」，共有兩個講題：（一）丁潔小姐講「天下名士有部落——常州學派的興起及其影響」；（二）周佳榮教授講「江山代有才人出——近三百年常州史家與史學」。

■ 亞洲文明與技藝工作坊

香港中文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周佳榮教授主持的「亞洲文明與技藝工作坊」，於2010年共舉辦了兩次：（一）11月23日，題目是「中國活字印刷術與東亞圖書事業的發展」；（二）11月30日，題目是「中日韓古船的歷史——從水密隔艙福船製造技藝談起」。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學界動態 ❖

2010年香港學界活動簡報

■ 新聞及報章專題講座系列

香港中央圖書館於2010年1月在該館演講廳舉行一連串公開演講，包括：

- ◆ 1月17日，由梁天偉教授（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系主任）主講「新聞背後——解讀新聞採訪及報導手法」；
- ◆ 1月24日，由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講「起承轉合——回顧百年新聞與社會興衰」；
- ◆ 1月31日，由張圭陽博士（香港電台訓練及發展組總監）主講「肩上天秤——探討新聞報導的道德與責任」。

■ 中國歷史科教學研討會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於2010年1月30日假座 The Mira Hong Kong 舉行《新視野中國歷史》教學研討會暨選修單元發佈會，內容分為兩部分：

- (1) 考評準則與設計，由梁操雅博士（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主講「如何以探究式教學適應中史科的考評要求」；
- (2) 選修單元專題探討，由范永聰博士主持，周佳榮教授、侯勵英博士主講「時代·知識分子·女性」；馬桂綿教授、梁頌佳老師主講「制度與宗教」。

■ 《歷史教育網絡》啟動儀式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於2010年4月24日假座香港童軍總會1030室舉行《歷史教育網絡》電子期刊啟動儀式，由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周佳榮教授主持，並由侯勵英博士作了介紹。

大會接著舉行「備戰中學文憑試工作坊」，由陳志偉老師主講「新高中試卷的擬題技巧」、許振隆老師主講「試卷分析及評估」。

■ 孫中山紀念館講座

香港孫中山紀念館於2010年夏季舉辦三個公開講座，詳情如下：

- ◆ 4月17日，黃紹倫教授（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行政所長）主講「何東家族與近代中國」；
- ◆ 6月5日，鄭宏泰博士（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主講「周壽臣與香港」；
- ◆ 6月12日，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主講「蔡元培的革命路」。

■ 香港口述歷史專題講座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香港教育學院合辦的「香港口述歷史專題講座」，包括兩個講題：（一）2010年6月19日，由梁操雅博士（香港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主講「教育與承傳：口述歷史所扮演的角色」；（二）6月20日，香港官立鄉村師範專科學校舊生、前鄉村學校校長及教師主講「教育與承傳：村校的人和事」。講座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舉行。

■ 2010年「亞洲出版研討會」

香港貿易發展局與香港出版總會主辦的「亞洲出版研討會」，2010年7月21日「香港書展」開幕當天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N201B室舉行，主題是「出版電子化的大變局——數碼出版對傳統出版生態的影響」，由香港出版總會會長陳萬雄博士致歡迎辭。會上以中文發言的演講有：

- ◆ 百道網總裁程三國先生：「三張圖表解讀數位出版和電子書現狀與未來」
- ◆ 城邦出版集團首席執行長何飛鵬先生：「一紙三螢雙核心」

以英文發言的演講包括：

- ◆ Mr. Christopher Paterson, Independent Publishing Consultant: “Digital Publishing: Challenges and Changes in the UK Market”
- ◆ Ms. Jill Reese, McGraw-Hill Professional, Director of Global Digital Sales: “The e-book Impact on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Present and Future”
- ◆ Mr. Nick Kind, Digit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irector, Macmillan Education: Video Presentation.

■ 亞洲研究專題講座系列 2010

香港公共圖書館與香港亞洲研究學會合辦的「亞洲研究專題講座系列 2010」，由2010年10月至12月間分三次在香港中央圖書館地下演講廳舉行，講座安排如下：

日期	題目	講者
2010年10月22日 (星期五, 下午 7:00-8:30)	香港「新語」——本地書報刊物對近代日文和中文的影響	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2010年12月9日 (星期四, 下午 7:00-8:30)	華人婦女遺囑背後的故事與時代	鄭宏泰、黃紹倫(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名譽教授)
2010年12月17日 (星期五, 下午 7:00-8:30)	香港股票投資與股票經紀行業——一名資深股票經紀的個人經歷	李培德(香港亞洲研究學會副會長)

■ 東華三院文物展覽及講座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東華三院合辦的「香江有情：東華三院與華人社會」專題展覽，2010年10月27日至2011年1月17日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其間並有講座系列：

◆ 10月30日，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林國輝先生及助理館長黃迺錕先生主講「香港有情：東華三院與華人社會」展覽籌備與製作介紹。

◆ 11月13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授丁新豹博士主講「香江有情：香港歷史上的大災難與東華三院的救災角色」。

◆ 11月20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何佩然教授主講「西體中用：香港醫療服務的現代化（1930-1970）」。

◆ 12月11日，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梁其姿教授主講「近代廣東中醫藥與善堂發展（1870-1940）」。

■ 孫中山紀念館週末講座

2010年冬季，孫中山紀念館舉行的週末講座計有：

◆ 10月23日，李培基先生（建築署高級建築師）及陳承緯先生（總館長/文物修復）主講「光輝再現——從甘棠第到孫中山紀念館」。

◆ 11月20日，黃媽梨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主講「何香凝與廖仲愷」。

◆ 12月4日，陳元珍女士（作家，陳友仁的媳婦）主講「志同道合——陳友仁與孫中山」。

■ 「獨立風骨——吳冠中捐贈展」

著名畫家吳冠中於2009年贈送33幅畫作給香港，包括12幅油畫及21幅水墨畫，香港藝術館於2010年夏舉辦專題展覽，展出吳氏歷次捐贈作品及其他館藏。展期至2010年8月29日。

■ 「城市漫遊者——社會紀實攝影」展覽

香港文化博物館於2010年6月19日至2011年1月3日舉辦「香港攝影系列」展覽二，主題是「城市漫遊者——社會紀實攝影」，作為香港文化博物館十周年誌慶節目之一。

■ 「歷久常新——旗袍的變奏」展覽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製衣學系合辦的「歷久常新——旗袍的變奏」展覽，由2010年6月23日開始，至9月13日為止，在香港歷史博物館舉行，展品包括二百多件旗袍及多幅珍貴照片。這個展覽旨在介紹晚清以來旗袍的淵源、發展和變化，以及在現代時裝設計方面的應用。

■ 「毋忘香港的根」展覽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深圳市文物考古鑒定所合辦的「毋忘香港的根——發掘港深七千年的歷史」展覽，2010年7月12日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舉行開幕禮，同日並舉行「香港懷古」DVD首發式。此次展覽以香港出土文物為基礎，展示本地六七千年前的文化內涵，配合深圳咸頭嶺遺址近年的考古新發現，展示深港兩地悠久的文化傳統。展覽舉辦至2011年6月30日結束。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學界動態 ❖

2011 年夏季香港學界活動預告

■ 第二屆“廿一世紀華人社會的歷史教育”研討會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及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將於 2011 年 4 月 20 至 21 日合辦第二屆“廿一世紀華人社會的歷史教育”研討會，會議主要討論當前華人社會的歷史教育，讓與會者分享歷史教學經驗與研究成果，並探索大學教育與中、小學課程如何互相配合。屆時會議將分別在香港樹仁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各舉行一天。

■ 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

為配合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的歷史盛事，由香港歷史博物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主辦，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孫中山文教福利基金會、中山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協辦的“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於 2011 年 5 月 6 至 7 日在香港歷史博物館演講廳舉行。與此同時，香港歷史博物館亦在 2011 年 3 月至 5 月舉行“辛亥革命百周年紀念”展覽。

■ The Sixth Annual Conference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香港洲研究學會第六屆周年學術會議)

The Six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ASAHK) will be held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n 4-5 May 2011. Conference participants are welcome to address issues in the study of Asia from a range of fields such as anthropology, business studies, communication, culture, economics, education, environment, film, gender and sexuality, health, history, literature, management, media, philosophy, politics, religion, and sociology. A Keynote speech or/and roundtable session will address on topics of Asian scholars and Asian humanities.

■ 第七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討會”

由香港浸會大學近代史研究中心及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合辦的第七屆“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討會：基督教區域研究”定於 2011 年 6 月 10 至 11 日在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召開，以“基督教區域研究”為會議主題。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